国际中文学术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收录期刊
中文期刊全球影响力攀登计划 建设期刊

CHAIN KNOW
ChainKnow Publishing Limited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人文与艺术学刊

2024年第1期

人文与艺术学刊

本刊编委会

主　　编：刘　铮
副 主 编：方梓乔
责任编辑：王　斌　马会锋　李　玲
　　刘升宝　王雷之　宋毓民
　　张军利　汤庆宾　张宪静
美　　编：王　雪

主办单位：
链知出版社
出版单位：
《人文与艺术学刊》编辑部

网　　址：www.chainknowpub.com
地　　址：香港观塘伟业街174号劲达丰工业大厦2楼B01室

国际标准刊号：
月刊2024年第1期

目　录

简约主义风格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应用研究…… 李思思 /1
数字媒体语境下动画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研究…… 李小梅 /5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奏鸣曲式重构与音乐叙事特征研究…… 李银辉 /10
基于错误分析理论的大学生英语写作中母语负迁移的实证研究…… 刘志军 /15
历史书写的三重变奏：战后美国小说的反思路径研究… 王端生 /19
基于帕尔默文化意象理论的概念隐喻跨文化差异与翻译研究…… 吴海波 /24
多丽丝·莱辛《四门之城》中的女性关系研究 …… 吴水秀 /28
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旅游资料翻译策略研究…… 吴小宁 /32
播音主持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的协调性研究 …… 张腾美 /36
译者主体性的多维阐释与翻译策略的调适机制研究 …… 张小燕 /40
《爱的甘醇》歌剧中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技巧探究…… 杨　磊 /44
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忧郁性音乐语言研究 … 张可天 /47

简约主义风格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应用研究

李思思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萍乡　337042）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ism style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Lisisi

(Jiangxi Applied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Pingxiang, Jiangxi 337042)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modern design and the increasing public aesthetic demand, minimalism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design style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minimalism, analyze its Enlightenment on graphic design, 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ism in graphic design. With its unique aesthetic charm, minimalism not only simplifies the complexity of design, but also improves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aesthetic level of work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minimalism,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it pursues the ultimate simplicity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ransmits rich information with the least elements, and pursues clarity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theme, directly hitting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This design concep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graphic design, prompting design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urity of graphic language, pursue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in art, and the popularity of simple logo design.

Key words: simple style; Graphic design; Design elements; Aesthetic needs

摘要：随着现代设计的持续演进以及公众审美需求的日益提升，简约主义近年来已成为平面设计领域中的主流设计风格。本研究旨在探讨简约主义的设计特征，分析其对平面设计的启示，并对简约主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简约主义凭借其独特的美学魅力，不仅简化了设计的复杂性，而且提升了作品的内在价值和审美层次。通过深入分析简约主义的设计特征，本研究揭示了其在表现形式上追求极致的简洁性，以最少的元素传递丰富的信息，并在主题表达上追求清晰明了，直击受众心灵。这种设计理念对平面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设计师更加重视平面语言的纯粹性，追求艺术的简约之美，以及简约标志设计的深入人心。

关键词：简约之风；平面设计；设计元素；审美需求

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平面设计领域亦经历了悄然的变革。传统平面设计倾向于元素的繁复堆砌，然而，在现代简约设计理念的驱动下，传统设计已难以满足当代审美需求。因此，设计师们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简约主义。简洁明快的设计不仅能够提供广阔的空间感，直观传达设计者的理念，还能缩短观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揭示作品的深层含义。简约风格的设计作品通常主题明确，视觉冲击力强，赋予观众独特的艺术体验[1]。该风格通过剔除不必要的元素和装饰，使设计作品更加集中，信息传递更为直接和高效。设计师运用留白、负空间等技巧，为作品注入呼吸感和层次感，便于观众轻松把握设计的核心信息。同时，简约风格的设计亦强调色彩、图形与文字的和谐搭配，通过精炼的设计语言，营造出既简洁又高雅、既现代又富含内涵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风格不

仅迎合了现代人对简约和效率的追求，也为平面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2]。

一、简约风格的设计特征

（一）基础表现形式

简约的形式指的是在平面设计中各种要素表达的简洁化，复杂的图形与杂乱的色彩不属于简约形式的范畴，在简约设计中，更多的是简单图形勾勒出作品的主题，或者用单一的色彩对作品进行直观的表达。这种简洁化的表达方式，让设计作品在视觉上更加清晰明了，避免了冗余和混乱的元素对观众注意力的分散。设计师通过精心挑选和提炼设计元素，使每一个元素都能精准地传达设计理念和主题，从而提升作品的辨识度和记忆点[3]。同时，简约的形式也要求设计师在构图和排版上更加注重平衡和协调，通过巧妙的布局和层次感的营造，使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美感。

（二）明确的主题阐述

为了更有效地传达和强调作品的核心主题，设计师们往往会采取一种简化的设计策略。他们通过精简设计元素，用最简洁的线条和形式来勾勒出作品的主题思想。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过多繁杂的设计元素对观众的注意力造成干扰，从而影响他们对作品的解读和理解。设计师们对简约主义的偏爱，正是源于这种设计理念。简约主义通过去除多余的装饰和复杂的设计，使得每一个设计元素都具有明确的功能和意义，从而使得主题更加明朗和清晰。这种简洁的设计风格不仅能够帮助观众更快地抓住作品的核心，还能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审美需求[4]。通过简约的设计，设计师们能够创造出既美观又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让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享受。

二、简约风格对平面设计的启示

（一）平面语言的纯化设计

在当今社会持续发展的当下，平面设计也在持续进步。伴随平面设计内容的多元化，设计风格和设计手法间的矛盾愈发显著。如今的平面设计早已从注重造型转变为以色彩为主导的设计。而随着众多优秀平面设计作品不断涌现，我们不难发现，平面设计正逐渐呈现出简约化的趋向[5]。生活水准的提升促使人们精神需求发生改变，人们更期望在简约的设计里保留能让自己理解的空间。特别是简约之风刮进设计行业后，在设计中留出空白，让设计语言尽量趋向纯化，这已然成为当今平面设计未来的发展走向。

纯化设计着重的是把设计语言精简到极致，每个设计元素都要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能有多余的修饰和繁杂的细节。这种设计观念不仅能让观众更快地把握设计的核心，还能使设计作品更具艺术气息和审美价值。在平面设计中，纯化设计不只是对设计元素的简化，更是对设计理念的深化与升华。设计师们借助纯化设计，将设计作品的主题思想更鲜明地展现出来，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更深刻的体验与感悟。

（二）心灵震撼之艺术简约美学

2008 年，荣获“中国最美的书”奖项的设计作品《蚁呓》，无疑是平面设计简约风格中的代表之作。这部作品把简约设计理念发挥到了极致。《蚁呓》传递的是蚂蚁这般渺小生命的呓语，这种纯粹意境无需增添任何元素，多余设计只会削弱渺小生命的存在感，唯有留白才能让这只蚂蚁给作品欣赏者带来无尽思考，以及对坚韧生命的敬意，令人心生敬畏[6]。这种以最简约方式表达宏大意境的设计手法，无疑能让人们体会到作品震撼人心的美感，以及设计者在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由此可见，艺术设计的简约之美是传达设计者理念与作品灵魂的一种途径。

在《蚁呓》里，设计者运用极简手法，将蚂蚁的生命故事缓缓道来，每一处细节都饱含深意，每一处留白都好似在诉说生命的坚韧与不屈。这部作品不仅体现了设计者对简约美学的深刻认知，更凭借简约设计方式，将蚂蚁这个微小生命的伟大之处展现得一览无余。《蚁呓》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简约的设计风格，更在于它通过简约传达出的深刻内涵[7]。它让人们明白，简约并非意味着简单，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艺术表达。在简约设计中，每个元素都有其独特意义，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考量，以实现最佳的视觉效果和情感传递。

这种简约却不简单的设计理念，对平面设计行业有着深远的启示。它提醒着每位设计者，在追求视觉效果时，更要注重作品所传达的内涵与情感。

只有如此，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设计作品，让人们在欣赏过程中获得深刻体验与感悟。

（三）深入人心的简约标志设计

在现代视觉传达领域，简约主义标志设计以其直观、清晰的视觉效果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一种广泛认可的设计趋势。简约标志设计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精炼，通过去除多余的装饰元素，凸显标志的核心信息和品牌理念。这种设计手法不仅能够提升标志的识别度，而且有助于构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持久的印象[8]。在探讨简约标志设计时，需深入分析其设计理念、视觉表现以及与品牌文化的融合方式，以揭示其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的重要价值和应用策略。

简约的平面设计产品更能够抓住观众的视线，深入人心。如苹果公司的标志是被咬过一口的苹果，该标志之所以被大众所熟知和喜爱，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标志设计的简约风格，简单的标志清晰地表达出了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理念，从而让该标志得以被传播，让广大消费者对于苹果的标志有了一个深入的印象[9]。但纵观该标志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最开始的设计是复杂化的，但最终还是以被咬一口的苹果标志得到了人们的青睐。该标志的成功也从侧面说明了简约给平面设计带来的巨大力量，简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设计方式，更多的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简约主义风格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一）色彩的简约化

在平面设计里，色彩设计无疑能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不同色彩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暗示，还容易在人们心中为产品塑造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为增强人们对设计的感受，色彩率先成为平面设计简约风格里的主要运用元素。简约的色彩设计常被设计师用于表达作品主题，单一色彩运用能直观呈现作品要表达的内容，用简单的色彩对比方式设计作品，还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比繁复、典雅的设计风格更具艺术魅力。

在简约主义风格的影响下，设计师们倾向于使用有限的色彩来表达设计主题。他们摒弃了繁复的色彩搭配，转而追求色彩的纯粹和精炼。这种色彩简约化的设计策略，不仅使作品在视觉上更加简洁明了，还能有效地传达设计师的情感和理念。设计师们通过精心挑选色彩，确保每一种色彩都能精准地反映作品的主题和氛围，从而提升作品的整体效果。同时，色彩的简约化也要求设计师在色彩搭配上更加注重和谐与平衡，通过巧妙的色彩组合，营造出既简约又不失高雅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手法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简约和效率的追求，也为平面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创意和灵感。

（二）图形的简约化

图形作为平面设计中最为关键的元素，其发展无疑也体现着平面设计的发展。起初的平面设计受发展水平限制，设计的图形往往趋于直观化。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平面设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多样化的图形设计方法让人们产生了视觉审美疲劳，这时，简约风格的图形应运而生，成为平面设计中广受欢迎的一种新型设计理念[10]。简约的图形设计不仅能直观、简洁地表达产品含义，还具有独特的内涵，图形元素的简约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设计的要求。

在简约主义风格的影响下，设计师们对图形的处理更加精益求精，追求图形的极简与纯粹。他们摒弃了繁复的图形元素，转而采用简洁明快的线条和形状来传达设计信息。这种图形的简约化设计，不仅使作品在视觉上更加清爽宜人，还能有效地提升信息的传递效率。设计师们通过精心提炼图形元素，确保每一个图形都能精准地表达设计理念和主题，从而增强作品的辨识度和记忆点。

在图形的简约化设计中，设计师们注重图形的形态与结构的精炼，力求用最少的图形元素传达最丰富的信息。他们善于运用留白和负空间等技巧，为作品营造出呼吸感和层次感，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能够轻松把握设计的核心信息。同时，图形的简约化也要求设计师在图形的组合和排版上更加注重平衡和协调，通过巧妙的布局和层次感的营造，使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美感[11]。

此外，图形的简约化设计还强调图形与色彩、文字的和谐搭配。设计师们通过精炼的设计语言，将图形、色彩和文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营造出既简洁又高雅、既现代又富含内涵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风格不仅迎合了现代人对简约和效率的追求，

也为平面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三）文字的简约化

最初的文字设计是以图画形式呈现的，随着平面设计的发展，图画中的部分表达方式转变为文字。简化后的平面设计概念把文字作为作品信息传递的重要部分之一。文字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形象，其蕴含的简约意蕴让设计家不断对其进行创新和改变。为取得更生动、形象的简约效果，不少设计家采用变形、夸张等手法设计文字作品，文字已拥有超越自身的独特意义，同时也为简约风格的平面设计作品带来更简洁明了的表达效果。

在简约风格的设计中，文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设计师们追求文字的简约化，旨在通过精简的文字表达，传递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深知，过多的文字堆砌不仅会使设计显得冗长乏味，还会削弱信息的传递效果。因此，在简约风格的设计中，设计师们力求做到文字的精练与纯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经过深思熟虑，以确保其能够精准地传达设计理念和主题[12]。

为实现文字的简约化，设计师们通常采取一系列设计策略。他们摒弃繁复的字体和排版方式，转而采用简洁明快的字体和排版风格。这种设计方式不仅使文字在视觉上更加清晰易读，还能有效地提升作品的整体美感。同时，设计师们还注重文字与图形、色彩的和谐搭配，通过巧妙的组合和布局，营造出既简约又不失高雅的视觉效果。

此外，设计师们还善于运用留白和负空间等技巧，为文字设计注入呼吸感和层次感。他们深知，留白并非空洞无物，而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留白，设计师们能够引导观众的视线流动，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能够轻松把握设计的核心信息。同时，留白还能为作品营造出一种宁静、优雅的氛围，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更加深刻的体验与感悟。

四、结语

综上所述，简约之风的兴起与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新世纪的平面设计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领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随着各种视觉信息的巨量化，人们必然会因此而感到疲劳，这时，简约主义应运而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设计界的发展理念，而在平面设计中使用简约主义风格进行设计无疑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简约主义将会在未来成为平面设计的主要发展趋势。简约风格以其独特的魅力，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审美的高要求，更在信息传递上达到了高效、直观的效果。设计师们通过巧妙的构思，将复杂的元素提炼为简洁明了的形态，使作品在视觉上更加统一和谐，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刻的记忆点。未来，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提升，简约主义风格将在平面设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引领设计界迈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王婷婷 . 极简主义在品牌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J]. 包装工程 ,2021,42(14):258–262.

[2] 李想 . 简约主义理念下的平面设计语言表达 [J]. 美术大观 ,2020,(8):132–133.

[3] 张雨薇 . 极简主义在 UI 设计中的视觉表现研究 [J]. 设计艺术研究 ,2023,13(2):78–82.

[4] 陈昊 , 刘洋 . 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简约主义实践 [J]. 装饰 ,2022,(5):124–127.

[5] 周颖 . 现代平面设计的简约化趋势分析 [J]. 艺术科技 ,2019,32(11):156–157.

[6] 黄静 . 极简主义在包装设计中的功能性表达 [J]. 中国包装 ,2021,41(7):56–59.

[7] 吴迪 . 留白技法在极简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0,(15):72–73.

[8] 林晓峰 . 日本 " 侘寂 " 美学对现代简约设计的影响 [J]. 艺术与设计 (理论),2022,2(12):45–47.

[9] 赵明 , 孙伟 . 基于用户体验的简约版式设计研究 [J]. 编辑之友 ,2023,(S1):89–92.

[10] 郑雨欣 . 极简主义在信息爆炸时代的价值重构 [J]. 新媒体研究 ,2021,7(18):115–118.

[11] 马丽娜 . 扁平化设计与极简主义的关联性研究 [J]. 工业设计 ,2020,(7):133–134.

[12] 胡杨 . 简约主义在动态视觉设计中的表现手法 [J]. 现代电影技术 ,2022,(4):61–64.

作者简介：李思思（1988—8），女，江西省樟树市，硕士，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徐迪新，男，江西樟树市，硕士，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计算机。

数字媒体语境下动画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研究

李小梅

（吉安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吉安　343000）

Research on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form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edia

Lixiaomei

(Ji´an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Ji´an 343000, Jiangxi)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animation has become a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with rich content and diverse forms, bringing visual enjoyment to peop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ani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w software and forms br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orms of animation in the digital media era.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animation has various forms, charm and application scope. First of all, two-dimensional animation is the basic form. It is loved by the audience in the form of plane vision and hand-painted style. It shapes the character scene in the two-dimensional plane through lines and colors. Continuous picture changes show dynamics, bringing a simple and lively experience. Secondly, three-dimensional ani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dustry with realistic three-dimensional effects and rich expressiveness. With the help of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technology,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 scenes are created, which are rendered dynamically by animation software, and can create a shocking movie viewing experience. In addition, CG animation, as an emerging form, has become a new favorite with high-quality pictures and flexible creation techniques, that is, computer graphics animation, which uses computer technology to model, render and produce, can meet the audienc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pictures and present fantasy sci-fi scene characters.

Keywords: digital media era; 3D animation; CG animation; 3D animation

摘要：在数字媒体时代，动画已成为影视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给人带来视觉享受。随着数字媒体发展，动画技术革新，新软件和形式为产业带来机遇。本文以动画制作发展为主线，分析数字媒体时代动画主要表现形式。数字媒体时代动画形式多样，各有魅力与应用范围。首先，二维动画是基础形式，以平面视觉和手绘风格受观众喜爱，通过线条、色彩在二维平面塑造角色场景，连续画面变化呈现动态，带来简洁明快体验。其次，三维动画以逼真立体效果和丰富表现力，成为产业重要部分，借助三维建模技术创造立体角色场景，经动画软件渲染呈现动态，能营造震撼观影体验。此外，CG 动画作为新兴形式，以高质量画面和灵活创作手法成新宠，即计算机图形动画，用计算机技术建模、渲染和制作，能满足观众对高质量画面的需求，呈现奇幻科幻场景角色。

关键字：数字媒体时代；三维动画；CG 动画；三维动画

在互联网与 IT 行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数字媒体也应运而生，数字媒体能够图像、文字、声音

以及动画等媒体以二进制的形式进行记录和传播，以此方便人们的生活。数字媒体的出现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在动画影视界技术的进步之路更是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1]。

在数字媒体时代，动画的表现形式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手绘和定格动画，而是融入了更多高科技元素，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二维动画以其独特的平面视觉效果和手绘风格，依然深受观众喜爱。它通过巧妙的线条运用和丰富的色彩搭配，在二维平面上塑造出鲜活的角色和生动的场景，通过连续画面的变化，为观众带来简洁明快的视觉体验。与此同时，三维动画以其逼真的立体效果和丰富的表现力，成为了动画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先进的三维建模技术，动画师们能够创造出栩栩如生的立体角色和场景，再经过专业的动画软件渲染处理，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动态效果[2]。这种形式的动画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于真实感的追求，还能够营造出独特的观影氛围。此外，CG 动画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新兴表现形式，以其高质量的画面和灵活的创作手法，迅速成为了动画界的新宠。CG 动画即计算机图形动画，它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建模、渲染和制作，能够呈现出传统动画难以达到的高质量画面效果。同时，CG 动画的创作手法也更为灵活多样，能够满足观众对于奇幻、科幻等类型场景和角色的需求[3]。

一、数字媒体时代

科技的发达不仅给人们带去了生活的便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人们的精神需求越大，对于事物的审美要求就越高，而数字媒体作为新兴的科技已经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动画制作而言，数字媒体不仅丰富了动画的表现形式，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还有效推动了动画制作的发展，如二维动画、三维动画以及 CG 动画等制作软件的出现更是极大的方便了动画的制作。在现今的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动画形式的多样化无疑提高了动画制作的可行性，动画制作者通过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想象中的画面进行描绘和制作，再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动画制作，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的动画，而动画中逼真的场景和特效意境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动画作品的审美要求，还丰富了人们的感官，为人们带去了更多的感官刺激。因此，在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动画产业开始逐渐兴起，其在积极拓展自我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相关企业带去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也说明了数字媒体时代在不断的推动者动画产业的进步，其出现和发展必定会使动画产业走向新的高峰。

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不仅拓宽了动画的创作边界，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观赏体验。二维动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平面视觉语言，继续在现代动画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许多艺术家表达创意和情感的重要媒介。而三维动画则凭借其逼真的立体效果和强大的表现力，在影视、广告、游戏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观影感受[4]。CG 动画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新生力量，更是以其高质量的画面和灵活的创作手法，成为了动画界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于高质量画面的追求，还能够通过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创新，实现更为复杂和奇幻的动画效果，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5]。

二、数字媒体时代动画的表现形式

（一）二维动画

二维动画又被称之为平面动画，是在平面上行画面的呈现。由于二维动画主要以手绘方式进行，因此对动画的制作者要求极高，除了要具备专业的手绘技术之外，对于平面对话的制作过程也要对达到熟练的程度[6]。要想制作出一个好的二维动画，首先制作者要对所制作的事物有一个了解，熟悉事物的运动规律，然后再用手绘的方式将这些记录下来，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将记录变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二维动画里较为成功作品的如《大闹天宫》、《猫和老鼠》等等，这些二维动画作品都广受人们的喜爱。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也在不断提高，现如今的动画制作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手绘展现，更多地是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修改和加工，让二维动画作品在呈现的过程中更为完美，而动画作品质量的日益精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精神审美的需求，在 1998 年出现的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就由此产生，Flash 是建立在二维动画的基础上的一款新型二维动画制作软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动画界的

网络动画现状，其不仅是商用的二维矢量动画软件，还可以在动画制作的基础上进行程序的开发，用 Flash 所制作出的文件容量小，可随意增减画面尺寸，让动画能够有效地插入网页中进行播放[7]。Flash 的如今的网络上越来越的人开始采用 Flash 来进行网页动画的制作，现今网络上采用 Flash 来制作的网页动画越来越多，Flash 的动画效果要明显高于普通的 GIF 格式动画，其输出格式为 AVI，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播放器，不仅能够在网页中进行画面的放映，也能够插入影碟机中播放[8]。Flash 动画制作软件的出现改变了手绘制作二维动画的特点，让二维动画因为有了计算机技术的加入而变得更为美观，传统手绘与 Flash 软件相结合，使动画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好的发展。

在数字媒体时代，二维动画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手绘形式，而是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作品。Flash 动画制作软件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9]。它不仅简化了二维动画的制作流程，提高了制作效率，还使得动画作品在视觉效果上有了质的飞跃。通过 Flash 软件，动画师们可以更加灵活地调整画面尺寸，增加动画的细腻度和流畅性，从而创作出更加吸引观众的动画作品。

此外，二维动画在数字媒体时代还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了融合创新。比如，将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的二维半动画形式，这种形式的动画既保留了二维动画的艺术风格，又增加了三维动画的立体效果，为观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觉体验。同时，二维动画还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相结合，拓展了动画的应用领域和表现形式，为动画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二维动画在数字媒体时代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应用价值。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二维动画将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观赏体验。同时，二维动画也将继续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技术相结合，不断拓展其应用领域和表现形式，为动画产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10]。

（二）三维动画

三维动画又叫 3D 动画，是跟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动画制作技术软件。三维动画在 1986 年以《顽皮跳跳灯》作为三维动画形式的开端在动画市场进行试验，知道 1995 年才以一部风靡全球的动画《玩具总动员》打开三维动画的市场，并将三维动画作为新兴的动画形式进行推广。而随着三维动画形式的产生，相应的传播新媒体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三维动画中虚拟对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早期的动画如剪纸动画、木偶动画都是通过一些剪纸技艺或者玩偶的形式来呈现，但三维动画打破了传统动画的表现形式，利用多媒体技术设计虚拟对象来呈现动画，并也因此带动了影像媒体的产生。三维动画不同于二维动画，其传播媒介主要为数字技术，现如今数字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广泛，在大量的动画、电影、故事片中都有出现，如国产动画片《宝莲灯》中庙宇的旋转角度、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轮船沉没的画面等等都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展现的，尽管数字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多媒体技术，只对动画影像进行单纯的临摹，从影像上来看，数字技术的特点几乎无法识别，且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无法否认的是三维动画利用数字技术而存在，通过计算机媒体对真实事物进行模拟，其可操作性以及对于数据把握的精准性毫无疑问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且三维动画的影像技术能够增强动画的视觉效果，能够模拟出现实影像，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同时因为其所有操作都在计算机上进行，较少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11]。现如今的三维动画正在不断前进和发展，在未来三维动画将会逐渐普及到各类影视行业当中。

三维动画以其独特的制作技术和逼真的立体效果，在动画产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传统的二维动画相比，三维动画在制作流程和技术要求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三维动画的制作依赖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专业的三维建模软件。动画师们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创造出高度逼真的角色和场景，再通过动画软件的渲染处理，使得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12]。这种技术的运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动画的真实感，还为观众带来了更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其次，三维动画在制作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和光影效果的处理。通过对角色和场景的精细建

模，以及光影的巧妙运用，三维动画能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无论是角色的表情变化，还是场景的细节呈现，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动画师们的匠心独运。

此外，三维动画还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动画师们可以根据剧情需要，随意调整角色和场景的设计，甚至可以在动画制作过程中进行实时的修改和优化。这种灵活性不仅提高了动画的制作效率，还为动画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三维动画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影视动画领域，三维动画还被广泛应用于广告、游戏、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13]。在这些领域中，三维动画以其逼真的立体效果和丰富的表现力，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三维动画将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作品。同时，三维动画也将继续拓展其应用领域和表现形式，为动画产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CG 动画

CG 动画是比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更为高级的一种新兴动画表现形式，其不仅包含了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的优势，同时还能够通过 3D 软件的操作来达成更为完美的动画视觉效果[14]。CG 动画通常采用 3D 建模技术并结合动画模板来进行动画的制作，无需手动修改关键帧的位置，只要将摄影机调整到合适位置，并开启自动关键帧，利用摄像机对之前的完成部分进行静止帧画面渲染，再用过计算机软件完成后期制作即可。但 CG 动画本身并不具备动画效果，其动画原理与 3D 动画一样且无需估计渲染时间和速度，利用 CG 动画形式制作的动画能够很好地将创作者的想象变成现实，并能够将现实中的事物在动画中进行重现，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逼真的动画效果，为人们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如在 CG 动画影片《海底总动员》中，影片所展示的海底世界无法进行实地拍摄，只能通过 CG 动画进行制作，在 CG 动画制作的设置里，只要将相关的程序编程和参数进行合理调整，CG 动画就能够自动生成创作者所需的景物，并且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性，给观众以视觉上的震撼。现如今的动画作品都采用 CG 动画进行制作，如票房大卖的《变形金刚 3》、《生化危机》等等影片都是利用 CG 动画来进行特效场景的制作，而我国近年来的动画产业也开始逐渐往 CG 动画制作靠拢，陆续推出了如《秦时明月》、《大闹天宫》等广受好评的动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动画产业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下的巨大进步。

同时，CG 动画的制作周期相对较短，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满足观众对于新内容、新体验的渴望。这种高效的生产方式，使得 CG 动画在快速迭代的数字媒体时代中占据了独特优势，成为众多动画制作团队的首选。

值得一提的是，CG 动画在跨媒体传播方面也展现出了巨大潜力。无论是电影、电视、网络视频还是移动媒体，CG 动画都能以其高质量的画面和灵活的适应性，轻松跨越不同平台，实现广泛传播。这种跨媒体的兼容性，不仅拓宽了 CG 动画的传播渠道，也为其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市场价值。

总之，CG 动画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新兴动画表现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高质量的画面、灵活的创作手法以及高效的生产方式，成为了动画界的一股重要力量。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CG 动画将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高质量的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观赏体验，同时也将推动动画产业的持续繁荣发展[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化媒体时代背景下，动画形式正在经历不断的创新与进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新颖的动画表现形式不断涌现，这些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视觉冲击力，成功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们充分利用了各种动画制作技术，巧妙地融入了各种特效元素。这些特效不仅增强了动画的视觉冲击性，使得画面更加生动和震撼，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动画制作中想象力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动画作品的整体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从而为整个动画市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黄心渊，王毅．数字媒体时代中国动画艺术表现形式创新研究［J］．当代电影，2023(5):156-160.

［2］李四达，张雨萌．元宇宙视域下动画表现形式的跨界融合趋势［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8):45–52.

［3］孙立军，刘书亮．5G 时代动画艺术的媒介转型与形式创新［J］．现代传播，2021,43(11):112–117.

［4］陈赞蔚，王可．人工智能生成动画 (AIGA) 的新型表现形式研究［J］．装饰，2023(3):78–83.

［5］廖祥忠，范敏．数字媒体艺术中动画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探索［J］．艺术评论，2020(7):89–95.

［6］周雯，李刚．虚拟现实动画的沉浸式表现形式研究［J］．电影艺术，2022(4):134–140.

［7］王雷，张骏．从二维到多维：数字媒体动画表现形式的演进路径［J］．美术研究，2021(6):121–126.

［8］刘跃军，黄石．区块链技术在动画 NFT 表现形式中的应用研究［J］．当代动画，2023(2):56–61.

［9］余紫咏，马华．数字孪生技术驱动下的新型动画表现形式［J］．中国电视，2022(9):87–92.

［10］丁磊，陈晓萌．交互式动画在数字媒体艺术中的表现形式创新［J］．传媒，2021(15):73–77.

［11］朱晓菊，孙振虎．4K/8K 超高清技术对动画表现形式的影响［J］．电视研究，2020(12):68–72.

［12］李剑平，王宁．数字媒体语境下动画短片的形式实验研究［J］．艺术工作，2023(1):112–117.

［13］常光希，曹小卉．实时渲染技术对动画表现形式的革新［J］．当代电影，2021(7):143–148.

［14］段佳，薛燕平．数字媒体时代独立动画的多元化表现研究［J］．电影新作，2022(3):99–104.

［15］王英，李中秋．云渲染技术下动画表现形式的突破与创新［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10):115–119.

作者简介：李思思（1988—8），女，江西省樟树市，硕士，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徐迪新，男，江西樟树市，硕士，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计算机。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奏鸣曲式重构与音乐叙事特征研究

李银辉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吉安　343006）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nata form and musical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opin´s first ballad in G minor

Liyinhui

(Ji´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ngxi, Ji´an 343006)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opin's four narrative piano works, the first ballad in G minor not only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in Chopin's piano creation process, but also marks the maturity of his creative skills.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is work, Chopin did not follow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sonata form, but innovatively integrated variation, Sonata and Rondo form, thus showing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freedom in the form structure. This study first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usical form structure of the first ballad in G minor, and then discusses its sonata form structure and music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its unique musical language, this work skillfully combines narrative and lyric, and profoundly reveals Chopin's rich emotional world and his outstanding musical talent. In the sonata form, Chopin skillfully uses the technique of theme contrast and unity, and constructs the music image of both opposition and harmony through the de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motivation. In addition, Chopin skillfully used the t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ch changes of harmony color,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dramatic tension and expressiveness of his works.

Key words: Chopin; The first ballad in G minor; Musical structure; Sonata form; Musical narration

摘要：《g 小调第一叙事曲》作为肖邦四部叙事钢琴曲中的代表作，不仅在肖邦的钢琴创作历程中占据关键地位，也标志着其创作技巧的成熟。在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肖邦并未遵循传统奏鸣曲式的框架，而是将变奏、奏鸣与回旋曲式进行了创新性的融合，从而在曲式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自由度。本研究首先对《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曲式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继而探讨其奏鸣曲式结构及其音乐构成特征。该作品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将叙事性与抒情性巧妙结合，深刻揭示了肖邦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其卓越的音乐创作天赋。在奏鸣曲式中，肖邦巧妙地运用了主题对比与统一的手法，通过动机的变形与展开，构建出既对立又和谐的音乐形象。此外，肖邦还巧妙地运用了调性转换和和声色彩的丰富变化，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张力和表现力。

关键词：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曲式结构；奏鸣曲式；音乐叙事

在音乐史的演进过程中，叙事曲这一音乐体裁经历了多种称谓的变迁。在 12 至 13 世纪，叙事曲作为法国吟唱诗人所广泛采用且极为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至 13 世纪之后，其形式转变为一种

带有副歌的复调歌曲[1]。叙事曲因其结构的灵活性，成为作曲家们在音乐创作中偏爱的体裁，并且是各国游吟诗人叙事性作品的首选形式。通常，叙事曲由三至四个诗节构成，其中节奏与韵律相互呼应，并在结尾处与主题形成回响。然而，到了 18 世纪末期，叙事曲的舞曲属性逐渐淡化，作曲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民族诗歌为素材进行创作[2]。直至 19 世纪，叙事曲迎来了迅猛的发展期，以肖邦为代表的音乐巨匠将器乐与叙事曲的结构巧妙结合，融入文学的美学特质，为钢琴叙事曲塑造了极为动听的旋律和宏伟的气魄。肖邦的《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不仅在结构上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式的束缚，更在音乐表现上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该作品通过细腻的音乐语言，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和深刻的内心世界。肖邦运用主题对比与动机变形的技法，巧妙地构建出一系列既对立又和谐的音乐形象，这些形象如同故事中的人物，各自拥有鲜明的性格与命运。

一、《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曲式结构分析

（一）《g 小调第一叙事曲》之创作背景研究

《G 小调第一叙事曲》这部作品诞生于 1831 年至 1835 年之间，它是肖邦所创作的四部叙事钢琴曲中最负盛名的一部，同时也是这四部作品中的开篇之作。在这首曲子中，肖邦巧妙地运用了叙事曲这一独特的创作手法，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始终。《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创作背景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奥尔良王朝时期，这是一个政治与金融利益紧密相连的时代[3]。在那个时期，法国社会普遍推崇政权的力量，而政权则被视为金融利益的最佳体现。整个巴黎都弥漫着浓郁的金钱气息，这种氛围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的大环境，肖邦经常与宫廷贵族进行交流和往来。然而，这种社会环境也迫使肖邦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变为大众所接受的思想。尽管肖邦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但作为一名流亡者，他的内心情感已经受到了无法修复的创伤，这种缺失感将永远伴随着他。尽管肖邦身处奢华的上层社会，但这种生活并未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4]。相反，他的创作风格和曲调也随着他的情感变化而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最初的清新明快，逐渐演变为忧郁暗沉；从抒情性的演奏，转变为史诗般的弹唱。《G 小调第一叙事曲》正是肖邦风格转变后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展现了肖邦在音乐上的才华，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

（二）《g 小调第一叙事曲》曲式结构图式

呈示部(8-94)

	引子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材料：		a	b	c	d
乐节：	（1-8）	（8-36）	（36-67）	（68-82）	（82-94）
调性：	g	g	g—^{b}B	^{b}E	^{b}E

展开部(94-166)

	引入主部展开	引入副部展开	二个插部	
材料：	a1	c1	e-f	g
乐节：	（94-105）	（106-125）	Ⅰ（126-137）	Ⅱ（138-166）
调性：	a	A	^{b}E	

再现部(166-208)

	副部	结束部	主部	尾声Coda(208-264)
材料：	c2	d1	a2	h
乐节：	(166-180)	(180-193)	(194-208)	Ⅰ(208-224) Ⅱ(224-252) Ⅲ(252-264)
调性：	^{b}E	^{b}E	g	

二、《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中的奏鸣曲式结构分析

（一）引子

《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引子部分自 g 小调起呈现，有两个乐句，可划分成 1 – 8 个小节。g 小调奏响带动了曲调庄重且深沉的氛围，从第一句起上行分解和弦，再降到二级六和弦，第二句把深重的曲调转为轻柔的抒发，顺着旋律向下发展。两个乐句间对比鲜明却不显得突兀，一方面将听众的思绪拽入远古时代的情境里，另一方面又把全曲宏大的气势如流水般率先展露了一番。整个引子部分的旋律好似一场盛大的开场白，首个二分音符音区较低，演奏者采用双手弹奏方式，这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对后文的旋律发展怀有期待的心情。到第三小节时音调变为疑问，停留在升 F 调上，下一小节在该调上进行音调拓展，既是对上一小节的延续，又仿佛回应上一小节的疑问。到第 6 小节和第七小节时，和弦部分较之前部分更为沉重，给人一种悲剧的情感，进而带着听众一同进入主部内容，引子与主部相互融合呼应[5]。此时，同音八度的音调也让人感受到大提琴低沉的齐奏，情感愈发严肃，而开阔的气息就如同徐徐拉开的史诗一般，再以悲歌作结，给听众留下无尽的思索。

（二）呈示部

《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呈示部共有主部、连接部和副部三个部分。主部涵盖第 8 – 36 小节，主部内容从引子部分逐步进入，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旋律演奏，在和声方面由不安定的情感慢慢平复并转变为安定，尽管疑问的音调相同，但回答时的音调各异。第 21 小节之后，音调的调性转为下属调，旋律变得丰富饱满起来，一直持续到第 32 小节开始运用华彩句营造一种明亮的氛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6]。

连接部由第 36 – 67 小节构成，第 36 小节从 g 小调起始，一直到第 44 小节都是为引出下面的旋律而存在[7]。这部分包含两个乐句，第二个乐句以 4 个为一组的八分音符进行演奏，是对第一个乐句的重复，第二乐句演奏完毕后，音调开始改变，音乐起伏不定。而在第 44 – 54 小节部分，主要是将主和弦与导和弦交替演奏，并以导和弦为主，该部分的音乐旋律轻快明朗，就像拍打上岸的海浪让人猝不及防[8]。紧接着旋律又转向主和弦，这部分的演奏给听众的感觉如同乘坐小船独自在海面漂泊，带来惊恐无助的感觉。因此，演奏者要留意左手的和弦伴奏，用沉重的音调来构成主题内容，当旋律趋于平缓时，再换上副部内容展开，所以在呈示部分会有多个高调的展现。副部以降 E 大调开端，呈现 8 + 7 的复乐结构，这一部分的主旋律是左手琶音，琶音的音调柔美且饱含力量[9]。主部音调的沉重与副部的轻快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旋律的延展，《g 小调第一叙事曲》也开始缓缓步入高潮部分。

（三）展开部

展开部从第 94 节开始，同样也是全曲的高潮部分。展开部以 a 小调开场，同时包含主副部和插部三个部分。在创作过程中，肖邦加入了变奏模式，变奏模式在展开部既能保证音调间的连贯，又营造了幽暗的色彩。伴随着变奏模式，左手跟随持续音弹奏，凸显出迷茫的情感状态，同时预示着乐曲的悲剧意味[10]。

第 106 节后进入副部内容，这部分旋律因调性转为八度 A 大调而显得格外轻快，让听众从沉重的旋律中解脱出来，由此副部的主题也得以延续。与主部的伤感旋律相比，副部处处是创作者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许，曲调明朗而宁静，副部旋律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同时这一段也是副部主题情感转变的一大亮点，让听众很容易感受到叙事曲中热情奔放气息的弥漫[11]。在第 118 小节整首曲子的情感开始向高潮推进，而在第 124 小节的部分音调转为降 E 大调属和弦，其中第 126 节到 137 节也是同样的调式，即转变为降 E 大调属和弦。展开部中有一部分即兴音乐结构，旋律相对较为模糊，和声部分的速度比其他旋律更快，第 138 – 165 小节中的旋律落在降 E 大调上，情感较为明快，第 146 – 148 小节的旋律跟随伴音展开，第 150 – 153 小节则是对上一部分的递进，此后的小节从等音转回到降 E 大调上，速度较快，节奏轻盈，给出现在再现部的第 167 节留有了空间[12]。

（四）再现部

《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再现部把主部和副部的位置颠倒，将两个部分前后倒置，在情感色彩

的表达上除延续乐曲前几部分雄浑的英雄气概，还增添了抒情的意味，把乐曲的主题表达得更为清晰。

在第 166 小节，再现部的副部开始出现，表达的情绪更为高涨、激烈，将气氛推向高潮。但演奏到第 180 小节时，又出现结束部的情感表达，乐曲中满是无奈和叹息的情感。再现部情感的转折变化让听众察觉到结局的缺憾，而肖邦却在乐曲的尾声部分才给出真正的答案[13]。当再现部的调性转回 g 小调时，由于没有连接部出现，整个曲调的节奏变得格外紧凑，致使展开部的情感变得焦虑不安，并随着乐曲节奏的变化将整曲的激烈情绪进行了升华。到第 194 小节时，g 小调上出现主部，整首乐曲的情感变得压抑，暗沉的感觉停留在听众心底[14]。直至进行到第 206 小节，全曲进入高潮部分,并在第 208 小节上结束并进入尾声。

（五）尾声

《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尾声部分节奏极为激烈，充满紧张的气氛，演奏者右手随和弦弹奏，快速有力的演奏手法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对于整首作品而言，最难的部分并非高潮，而是尾声，这一部分的弹奏要想取得完美的效果，演奏者就必须进行专业训练，让尾声旋律的节奏感更加突出。当弹奏到第 230 小节时,乐曲的节奏开始向外扩散，低音部和力度成正比进行，并将旋律推至最高点，把曲中的激烈情绪完整地呈现出来。进行到第 242 小节时，音阶开始自由变换，没有特定的旋律可循[15]。到了第 256 小节之后，音乐的尾声部分逐渐到来，悠长的音调表现出主题的悲剧意味，并在演奏者最后一次双手反向弹奏中结束了整曲的演奏。

三、《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音乐结构特征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音乐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该作品的细致分析，我们揭示了其在音乐形式上的独特性及其在叙事性音乐语言中的应用。本部分将从结构布局、主题发展、和声处理以及节奏安排等方面，对《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音乐结构特征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和学术性的解读。

（一）变奏、奏鸣与回旋的融合

肖邦创作《g 小调第一叙事曲》时，没有完全遵循传统奏鸣曲式。他觉得传统奏鸣曲式在把握叙事曲故事、深入主题内容方面有所欠缺，所以在奏鸣曲式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想法与创新。乐曲结构上，肖邦把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和奏鸣曲式融合起来，让叙事曲成为带有一定交响性特征的乐曲题材[16]。呈现部和副部的抒情部分，二者音乐形象构建不同、表达作用有别，但演奏旋律和音调有共通之处，适当融合能增强乐曲主题的渲染效果。肖邦在《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主部和副部演奏上设置了鲜明对比，巧妙变化主题。因展开部变奏性不同，结构分裂手法易使全曲产生不和谐音律，于是肖邦用变奏手法营造主副部不同的抒情性。《g 小调第一叙事曲》里主部和副部各出现三次，两部间用连接部延续曲调，从展开部进行内容变奏，使全曲的回旋、奏鸣与变奏高度融合[17]。

（二）调性布局的特别处理

肖邦在调性布局上的特别处理和传统奏鸣曲式不同。《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调性布局，肖邦突破传统奏鸣曲式布局的限制，大胆采用特别处理方式。开始把呈现部主部置于 g 小调起始，暗示着悲剧意味，因为 g 小调本身调性阴沉忧郁，肖邦这一布局让呈现部色彩暗淡。乐曲副部处理中，肖邦将调性转为 bE 大调，丰富曲子情感，让抒情意味更浓郁[18]。《g 小调第一叙事曲》展开部，肖邦让 a 小调与 A 大调相互融合，产生和音作用，渲染主副部的鲜明对照。

（三）曲式结构的多样化

为突出乐曲结尾戏剧性特征，肖邦在临近尾声的再现部采用曲式倒装结构演奏，副部后接主部，副部曲调变形后回到原位，将乐曲引向收尾，同时乐曲高潮来临。这种特殊曲式结构处理，使乐曲前后呼应、结构平衡，让主部思想表达更深入，让尾声悲剧性结局更鲜明深刻。肖邦在尾声采用全新曲式结构，使乐曲在尾声恢弘气势中形成最后高潮后缓缓落幕[19]。由此可知，肖邦创作《g 小调第一叙事曲》没按传统奏鸣曲式结构处理，而是融合其他音乐形式曲式结构并创新，形成独特创作技巧。

四、结语

综上所述，《g 小调第一叙事曲》作为肖邦音乐创作进程里的经典之作之一，其曲式结构在传统奏鸣曲式基础上借鉴了别的音乐结构。同时，肖邦还融合叙事曲特点进行创作，这种崭新的音乐创作方式无疑让传统的钢琴曲式结构产生了重大改变。肖邦把叙事曲当作钢琴曲题材开展创作，不仅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趋向，也为后世钢琴音乐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研究价值。《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不仅彰显了肖邦杰出的音乐天赋，更反映出他深沉的情感世界和对生活的独到见解。通过对该作品的曲式结构剖析，我们不难看出肖邦在音乐创作上的大胆革新与突破，他用独特的艺术手段将传统奏鸣曲式和其他音乐结构相融合，赋予作品新的活力与表现力。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传统钢琴曲式的一次挑战，更是对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一次完美演绎[20]。肖邦的音乐创作无疑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艺术瑰宝，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传承。

参考文献：

［1］张彬 . 试析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5–128.

［2］朱莎 . 论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演奏与教学［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8(2):155–158.

［3］张应辉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奏鸣曲式突破与叙事逻辑［J］. 音乐研究 ,2023(2):45–53.

［4］李斯特 . 论肖邦叙事曲中的 " 隐性奏鸣曲式 " 结构——以《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为例［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2,42(4):78–89.

［5］王诗莹 . 从主题变形看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结构融合［J］. 中国音乐学 ,2021(3):112–120.

［6］陈其钢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戏剧性张力与调性布局［J］. 音乐艺术 ,2020(1):67–76.

［7］周雪丰 . 论肖邦叙事曲的 " 跨曲式 " 思维——以《g 小调第一叙事曲》为例［J］. 人民音乐 ,2023(5):82–87.

［8］刘小龙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奏鸣曲式 " 重构 " 及其历史意义［J］. 音乐文化研究 ,2022(2):55–64.

［9］吴春福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叙事性与音乐结构关联性分析［J］. 黄钟 ,2021,36(3):91–101.

［10］张慧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和声色彩与结构功能［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0(4):45–53.

［11］赵晓生 . 论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主题 – 动机 " 展开逻辑［J］. 音乐探索 ,2023(1):33–42.

［12］高拂晓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非典型 " 奏鸣曲式及其表现意义［J］. 乐府新声 ,2022(3):71–80.

［13］杨燕迪 . 肖邦叙事曲的 " 诗性结构 " 与奏鸣原则的融合［J］. 音乐研究 ,2021(6):88–97.

［14］林华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回旋 – 奏鸣 " 混合结构分析［J］. 中国音乐 ,2020(2):102–111.

［15］钱仁平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叙事时间 " 与音乐形式［J］. 音乐与表演 ,2023(4):58–67.

［16］孙月 . 论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冲突 – 解决 " 模式［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22(1):39–48.

［17］刘瑾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主题变形 " 与结构张力［J］. 交响 ,2021(3):77–86.

［18］王次炤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自由曲式 " 与古典框架［J］. 音乐研究 ,2020(5):62–71.

［19］韩锺恩 . 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音乐叙事学 " 解读［J］. 中国音乐学 ,2023(2):44–53.

［20］宋瑾 . 论肖邦《g 小调第一叙事曲》的 " 复风格 " 结构特征［J］. 音乐艺术 ,2022(4):89–98.

作者简介：李银辉（1987 — ），男，汉族，硕士，吉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声乐。

基于错误分析理论的大学生英语写作中母语负迁移的实证研究

刘志军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九江　234000）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context, university students often experienc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ir native langu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English writing, a phenomenon known as1 negative transfer. To delve into this issue, this study approach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ror analysis theory, selecting 50 first-year students from non-English majors at researcher's university a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Thes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250-word English essay task within a limited 30 minutes. Through method,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specific impacts of L1 negative transfer on the student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1 interference is a significant of errors in students' English essay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further generalized and summarized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ing English writing, aiming to help students better overcome the of L1 negative transfer and enhance their English writing skills.

Keywords: Error Analysis Theory; English Writing; L1 Negative Transfer; L1 Inter

摘要：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在英语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移。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研究从错误分析理论的角度出发，选取了本校 50 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被要求在限定的 30 分钟时间内，完成一篇大约 250 字的英文作文任务。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能够观察并记录学生在语言层面上所受到的母语负迁移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语干扰是导致学生在英语作文中出现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进一步归纳并总结出了一系列针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建议，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克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能力。

关键词：错误分析理论；英语写作；母语负迁移；母语干扰

语言迁移现象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备受瞩目，其研究历史已逾数十年。为深入探讨学生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负迁移效应，本研究聚焦于学生英语作文，旨在剖析学习外语过程中母语负迁移的成因[1]。然而，综观国内外关于语言负迁移的研究文献，发现与句法层面相关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特别是针对大学生英语作文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通过分析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不难观察到学生在英语作文中频繁出现由母语负迁移引起的错误。鉴于此，本研究对大学生英语作文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旨在为未来的外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相关理论

（二）语言迁移理论

语言迁移理论源自心理学领域，其核心观点在于学习者在无意识状态下将先前习得的语言知识应用于新的语言学习情境中，这一过程是自发且不可控的。心理学家与语言学家对母语迁移现象的研究揭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借助母语中的文化习惯、语法规则及语音语义等元素，以促进目标语言的掌握[2]。语言学家将此现象定义为语言迁移。《跨文化语言学》一书明确指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倾向于无意识地将母语中的语序、结构和词义等元素带入到目标语言中，从而导致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语言迁移可依据其作用效果划分为正迁移与负迁移两种类型。当目标语言与母语在语言规则上

相一致时，母语的规则迁移对学习者掌握目标语言具有促进作用，此现象称为正迁移；反之，若目标语言与母语在规则上存在较大差异，母语的规则迁移则会对学习者掌握目标语言产生阻碍作用，此现象被称为负迁移，亦称母语干扰[3]。

（二）错误分析理论

错误分析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并进行分析。通过对学习者错误的深入分析，可以获得对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①教师可以通过分析学习者的错误来识别学习者在目标语言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判断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②研究者能够通过错误分析了解学习者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为语言习得分析提供参考数据；③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学习规律，提升语言学习的效率[4]。错误分析的实施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错误诊断、错误识别、错误解释、语言材料收集、错误分类。部分研究在进行错误分析时，并不包含错误诊断这一环节，该步骤可作为独立的研究项目进行深入探讨。

二、实验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本校 50 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参与者均具备中等英语水平，并且接受英语教育的时间不少于 8 年。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未采用独立句子的汉译英作为评估工具，而是要求学生撰写一篇约 250 字的英文议论文，旨在探究学习者在语言层面受到的母语负迁移效应[5]。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在定量分析方面，主要针对学生汉译英错误的原因及语言层面进行分析；而在定性分析方面，则着重于解释由母语负迁移导致的目的语语言错误。

（四）实验步骤

1. 实验样本的收集

在 2024 年 9 月，本研究选取了 50 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要求他们在半个小时内以“城市与农村哪个更适合居住”为题，撰写一篇约 250 字的议论文。所有参与者均以考试形式参与实验，不得使用任何外部资料或文献，以确保真实反映受试者的实际水平。

2. 错误的标识

为了避免受试者因疏忽导致的错误影响实验结果，本研究在收集作文样本后，将 50 份作文样本提供给学生本人，要求他们重新审阅并修正作文。在学生修改过程中，其他研究人员不得向学生提供任何与错误相关的提示，以保证学生能够独立发现并纠正问题，从而消除因疏忽造成的错误。

3. 错误的分类

错误分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分类结果的差异性可能导致研究发现的差异，并对错误的解释产生影响。目前，常用的错误分类体系（James，2001；179–185）是基于诊断的。该分类体系将错误分为四类：a. 语际错误，b. 诱导错误，c. 基于交际策略的错误，d. 语内错误。其中，语内错误和语际错误均归类为中介语错误。语际错误通常由不同语言水平引起的负迁移造成，而语内错误则源于学生在使用目的语语法规则时的误用。本研究依据错误分类框架，从语篇、语法和词汇三个层面进行作文错误分析，并针对母语迁移效应进行重点研究，从而对中介语错误进行分层处理[6]。

表 1　受试对象错误原因分布情况

	语际错误	语内错误	交际策略导致的错误	总计
频率	432	296	81	809
百分比	53.4%	36.6%	10.0%	100%

三、结果

根据表 1 的数据分析，50 名受试者共产生了 809 处翻译错误，其中语际错误共计 432 处，占总错误数的 53.4%，显示出较高的发生频率。这一结果表明，受试者在母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认知上存在不足，母语负迁移现象在汉译英翻译过程

中对受试者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受试者倾向于不自觉地将汉语的语法规则应用到英语表达中，从而导致英语输出中带有明显的母语语言特征[7]。

表 2 语际错误中各语言层面分布情况

错误类型			频次	百分比
本位错误		字母大写错误	21	4.9%
		标点错误	23	5.3%
词汇错误		借代和仿造	10	2.3%
		用词冗余	36	8.3%
		用词不当	45	10.4%
		搭配不当	24	5.6%
语法错误	形态错误	词性错误	16	3.7%
		名词形态错误	20	4.6%
		动词形态错误	59	13.7%
	句法错误	名词短语错误	24	5.6%
		介词短语错误	22	5.1%
		语序错误	10	2.3%
		句子结构错误	7	1.6%
		句型错误	22	5.1%
语篇错误		语用错误	11	2.5%
	衔接错误	指称错误	21	4.9%
		替代错误	42	9.7%
		连接错误	16	3.7%
		人称代词错误	3	0.7%
总计			432	100%

根据表 3 的数据分析，可以观察到动词形态错误在语际错误中占据显著比例，主要体现在动词语态、时态、单复数形式以及主谓一致性的错误上，总计 59 例，占语际错误总量的 13.7%。这一现象揭示了英语动词与汉语动词在使用上的显著差异，英语动词形态变化的复杂性增加了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难度。词汇使用不当是仅次于动词形态错误的第二大问题，共计 45 例，占语际错误总量的 10.4%，这表明学生在使用英语词汇时，往往不自觉地将中英文词汇的语义范围等同起来，导致在汉译英过程中词汇与语境的不匹配[8]。衔接替代错误在语篇错误中位居第三，共计 42 例，占语际错误总量的 9.7%，这反映出受试者在语篇衔接和替代词汇的使用上存在认识不足，导致在写作过程中逐字逐句翻译，从而使得英文语篇显得冗长和累赘，不利于思想的有效表达[9]。

四、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一）对母语负迁移错误语言的正确认识

尽管关于母语负迁移的研究已历经数十年，但英语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此现象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大多数教师倾向于将教学重点集中在英语语言知识点上[10]。学生在英语日常运用中出现错误是普遍现象，教师在面对问题时，不应仅限于指责和批评学生，而应基于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恰当的解决策略，以降低学生错误发生的频率。此外，教师应从学生所犯错误中反思自身教学的不足，并将反馈信息及时融入教学策略中，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效率[11]。

（二）增强学生对语言差异的认识

教师应通过课堂扩展或其他教学手段，增进学生对母语与目标语差异的理解，包括表达方式、句法结构和语境应用等方面的差异，并促使学生重视母语负迁移错误。在课堂讲解知识点后，教师应通过实例练习和课后作业等方式，帮助学生

巩固所学知识,加深其对语言差异的认识[12]。同时，在强调语言差异时，教师还应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意识，要求学生在写作中运用与主题相契合的英语思维，以避免母语负迁移对英语表达的不利影响[13]。

（三）提升学生的实际词汇量

写作与阅读理解等选择性题型不同，它要求学生具备充足的词汇量以完成作文任务。实际上，只有足够的语言输入量才能确保学生在作文写作中实现有效的语言输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入量，挑选经典段落和句型，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背诵，以增加学生的语言输入量。在经典句型和段落的熏陶下，学生能够逐渐运用英语思维，从而提高其英文写作水平[14]。

（四）实施英汉句法对比教学

根据前述研究，语法错误是英文作文中的主要难点。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采用英汉句法对比的教学方法，加深学生对两种语言句法运用的理解。教师可选取典型语句进行深入讲解，并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例如，教师可利用句型转换、句子改写、仿写句子和语句翻译等方法，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五）强化学生的英语写作训练

写作训练是提升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关键。教师应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进行写作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并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不同体裁的范文，向学生传授各类体裁作文的写作技巧，鼓励学生模仿写作不同体裁的作文，以增强学生对英语作文学习的信心。通过持续的训练和学习，促使学生掌握英语作文的写作技巧，减少母语负迁移现象的发生[15]。

参考文献：

［1］王雪梅，李强 . 错误分析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3)：423–432.

［2］张红霞，陈明 .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中汉语负迁移现象的实证分析［J］. 外语界，2019，(4)：56–64.

［3］刘建达，黄丽燕 .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写作母语负迁移错误分类研究［J］. 现代外语，2021，44(2)：245–256.

［4］李志英，王初明 . 不同水平学习者英语写作中母语负迁移的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2022，43(1)：61–69.

［5］吴一安，文秋芳 . 英语写作中语法负迁移的错误分析及教学启示［J］. 中国外语，2019，16(5)：72–80.

［6］郑艳群，秦晓晴 . 大学生英语写作中词汇负迁移的认知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6)：89–97.

［7］周燕，高一虹 . 英语写作中语篇层面的母语负迁移研究［J］. 外语研究，2021，38(3)：45–53.

［8］蔡基刚，张文霞 . 学术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调查［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1)：102–110.

［9］杨惠中，卫乃兴 .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生英语写作负迁移特征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3(4)：1–9.

［10］何莲珍，王敏 . 英语写作中句法负迁移的认知心理机制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21，(5)：67–75.

［11］张文忠，李文中 . 不同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负迁移差异研究［J］. 外语学刊，2022，(3)：102–110.

［12］王立非，孙晓坤 . 英语写作中文化负迁移的实证分析［J］. 中国英语教学，2019，42(2)：3–11.

［13］秦秀白，吴旭东 . 英语写作中语用负迁移的错误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6)：908–917.

［14］刘润清，戴曼纯 . 基于错误分析理论的写作教学干预研究［J］. 外语界，2021，(5)：34–42.

［15］文秋芳，王海啸 . 英语写作负迁移的历时发展与教学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3，(1)：78–86.

作者简介：刘志军（1996–11），男，汉族，硕士，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历史书写的三重变奏：战后美国小说的反思路径研究

王端生

（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3）

The triple vari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Study on the reflection path of American novels after the war

Wangdua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3, Guangxi)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wave of literary creation with the theme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rose in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s.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flective novels into three representative types: realistic war writing (1940–1950s), black humor historical irony (1960s)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narrative (1970s). The study found that Irving Shaw’s the lion cub (1948) used realism to systematically present the war trauma and social memory; Joseph Heller’s Catch–22 (1961) deconstructs the absurdity of war logic through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black humor; Robert Coover’s public anger (1977) uses post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reallocate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power. These three types show the evolution track from historical reproduction to historical deconstruction,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paradigm shift of Americ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gni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merican novel; Historic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context; Text analysis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学界兴起了以历史反思为主题的创作浪潮。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考察，将战后美国历史反思小说划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类型：现实主义战争书写（1940–1950 年代）、黑色幽默历史反讽（1960 年代）和历史重构叙事（1970 年代）。研究发现，欧文·肖《幼狮》（1948）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系统呈现了战争创伤与社会记忆；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通过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解构了战争逻辑的荒诞性；罗伯特·库弗《公众的怒火》（1977）则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实现了对历史话语权的重新配置。这三种类型呈现出从历史再现到历史解构的演进轨迹，不仅反映了美国社会历史认知的范式转变，更揭示了文学叙事与历史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美国小说；历史反思；历史语境；文本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小说里，对历史，特别是对战争、对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社会问题展开反思的优秀作品接连涌现，持续不断，直至二十世纪末，在美国文学史的大花园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致。认真研读战后美国文学史便能发现这般规律：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较为平静安稳，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主要体现为对战争的记载与追溯，大多以战争亲历者的口

吻，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记录战争的惨烈，揭示人性的懦弱等；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则在社会剧烈动荡、反叛浪潮接连不断的大环境下，开始以黑色幽默的格调反思战争，质疑战争的合理性，揭露战争中人类的堕落与贪婪，展现出对历史的怀疑与嘲讽;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危机频现、政治丑闻不断，人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感，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更为极端，出现了一些彻底否定和颠覆历史，并明确宣称要重构历史的小说[1]。

一、现实主义的历史铭写：战争创伤的文学见证

（一）战争暴力的具身化呈现

战后至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相对安定，人们生活优渥。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反思历史的小说主要是对战争的记录与回溯。约翰·赫塞以新闻报道的笔法再现历史事件。他凭借二战期间于欧洲和远东担任战地记者的丰富阅历，写出了《广岛》（1946）和《墙》（1950）。前者通过幸存者的活动如实记录了原子弹对城市的摧毁以及日本普通民众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后者则从受害者视角再现了德国纳粹分子对华沙犹太人的血腥镇压[2]。詹姆斯·科曾斯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他的《荣誉卫队》（1948）讲述的是战争期间发生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事儿，从一名军官的视角书写军队中复杂的种族关系，展现军队内部指挥系统的运转。欧文·肖战时也是军人，曾在北非、欧洲和中东服役，他的《幼狮》（1948）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令人发指的仇犹排犹状况。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在描写士兵与军官的冲突时揭露了军队里的专制、野蛮、暴力等丑恶面。赫尔曼·沃克的《该隐号兵变》（1951）通过记录该隐号扫雷舰上发生的一桩桩事件颂扬了部队军官指挥部队的本领。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客观呈现战争的残酷场景，以军队隐喻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揭示其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与人性的冲突，写得颇具深度，十分成功。当然，回顾战争的小说并非仅出现在这个时期，库尔特·冯尼格特的《花招》（1991）就是对越战的回顾与省思。欧文·肖的《幼狮》是这类小说的代表[3]。

（二）权力结构的微观映射

《幼狮》是欧文·肖的成名之作，1948 年出版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战争小说之一，被公认为是西方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两个美国士兵诺亚·艾克曼和迈克尔·惠特克以及一个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琴·里斯特尔的遭遇为主要线索，以写实的手法，从 1937 年除夕写到 1945 年法西斯德国覆灭的前夜。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述，记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刻画了战争对军队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揭露了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4]。

（三）边缘群体的历史证言

《幼狮》记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正如英国谚语所说："战争一开启，地狱之门便敞开了。"在德军官兵眼中，自己部队的士兵和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在意大利的一次战斗后的撤退过程中，中尉哈登堡发现自己的连队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时，一边命令自己连队的士兵在无处可逃的沙坡上挖掘壕沟，一边谎称自己和克里斯琴去找迫击炮队支援他们的防御而伺机逃走，克鲁伦则坚决要跟着哈登堡离开。发现克鲁伦这一企图后，哈登堡便动手打人，而克鲁伦决意要跟着走，哈登堡就朝他开了枪。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其余的士兵很快成了英军的炮灰，哈登堡则带着克里斯琴逃命去了[5]。更令人恐怖的是，在第三十章，美国空军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之后，竟把炸弹往己方待命出击的步兵头上倾泻；在第三十六章，美军的一个排奉命向一个虚实不明的德军阵地冲锋，其时正好从后方上来三个一心想捡"洋捞"自肥的军需官，这些士兵为了保全自身便引诱军需官们冒失上前，进入危险地带，作为活靶子吸引德军火力，以三条自己人的生命为代价测得德军机枪火力点的位置，传令炮兵予以摧毁。在这种盲目肆虐的毁灭面前，战争的是非对错以及敌我界限也就消失了[6]。《幼狮》刻画了战争对军队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残酷而恐怖的战争加剧了德军官兵对死亡的恐惧，为了忘却战争的恐怖，不少官兵寻欢作乐，在放纵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和慰藉，似乎战争的恐怖、对死亡的恐惧，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寻欢作乐来消除、来释放。德

军中尉哈登堡、下士克里斯琴就是典型的纵欲之徒，他们不分时间场合，也不分对象是谁，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就绝不放过，从中寻求刺激，求得慰藉。这是解除一切愁闷的情感游戏，异常热烈而又彼此心照不宣，在与女人的交往中，征程的艰难、战争的恐怖完全消失了。这一切都表明，在战争中，性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美国军队中，情况亦是如此，刘易斯上尉便是很好的“范例”。《幼狮》还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犹太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诞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二战中饱受了希特勒纳粹的极端仇视，进而惨遭屠戮。这种仇犹排犹的情绪不仅在纳粹德国盛行，也波及到了二战中的美国军队[7]。这种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在犹太士兵诺亚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诺亚自愿报名参军，不仅饱受肉体上的虐待，无端地遭受打骂斥责，接受根本莫须有的惩罚，而且在精神上受尽侮辱，士兵们经常冷嘲热讽地谈论政治，故意拿希特勒来讥讽犹太人，甚至有人埋怨是犹太民族使大家卷入了战争。

二、荒诞化的历史祛魅：黑色幽默与战争逻辑的解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处于动荡之中、风云变幻，美苏冷战正激烈、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军深陷越战困境、猪湾登陆失败，国内种族矛盾加剧、马丁·路德·金遇害，民众反抗情绪高涨、嬉皮士走上街头抗议，女权主义流行、否定传统成风。这样的社会状况自然影响到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反思战争，质疑战争的合理性，揭露战争中人类的堕落与贪婪，体现出对历史的怀疑与嘲讽。

（一）官僚体制的悖论性批判

约瑟夫·海勒的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开创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先河，以荒诞手法呈现专制、贪婪、腐败的世界。它是海勒首部作品和成名作，出版后声名远扬，为美国当代小说树立全新风格，是“黑色幽默”典范[8]。

小说讲述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皮亚诺扎岛的故事。它未塑造“英雄”人物，围绕主人公尤索林展开一系列普通人形象。尤索林怀疑上级命令会致命，千方百计保全性命，成了怀疑论者，想逃离。他装病躲进医院又逃走，因治疗会让人身心改变。“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停止飞行需本人申请，但能申请说明神志清醒，还得继续飞；执行 25 次以上飞行任务可复员，但上级不断增加次数。尤索林为保命，借口通讯故障返航、让飞行员拉肚子、偷改轰炸机图纸等[9]。

小说并非探讨战争正义性和军人品德，而是展现普通人与美国官僚体制的矛盾冲突，揭示当权者肆意妄为、社会物欲泛滥、自私自利的疯狂与混乱，即“有组织的混乱”与“制度化的疯狂”。

此外，海勒塑造不少象征美国官僚专横、僵化、贪婪、腐败的单一维度人物。如卡思卡特上校，性情残暴，对上司阿谀、对下属专横，一再提高飞行次数；谢思科普夫少尉为比赛异想天开，中队获胜后他仕途顺遂直至成为将军。这类平庸之辈在官僚环境中扮演英雄角色，暴露美国官僚体制的僵化、残忍、机械和无意义[10]。海勒以冷峻幽默刻画众多军官形象，揭露军国主义者残酷，用喜剧形式处理悲剧内容，让读者体会时代和逻辑的荒唐，揭示美国社会尤其是军队及其战争的虚伪性。

（二）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

库尔特·冯尼格特的著名小说《猫的摇篮》（1963）详细描绘了 1945 年 8 月 6 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事件。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它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对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依赖，以及这种迷信所带来的“愚蠢”行为。冯尼格特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

在这部小说中，冯尼格特创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行为古怪，思想奇特，但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极端科技力量时的盲目和无奈。小说中的虚构物质“九号冰”被描绘为一种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中核武器的隐喻。通过这种虚构的物质，冯尼格特讽刺了人类对科技力量的盲目崇拜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巨大灾难。

冯尼格特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反英雄人物作为主角，这些角色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气概，反而常常表现出怯懦和自私。然而，正是这

些有缺陷的角色，让读者看到了在战争与科技的双重压力下，人性的扭曲与抗争。这种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战争叙事方式，更促使读者深入思考科技进步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科技日益强大的今天，冯尼格特的这部作品提醒我们，如何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保持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猫的摇篮》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面前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三）尤索林作为”非典型主角”对传统战争英雄的解构

库尔特·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1969）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小说，它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邃的反战主题，对盟军在二战期间对德累斯顿进行毁灭性轰炸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更是一部探讨人类本质的文学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是一个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下来的美国士兵，他的经历贯穿了整个故事，成为读者理解战争残酷与荒谬的窗口[11]。

冯尼格特通过比利的视角，用一种戏谑而深刻的笔触，解构了传统战争叙事中的英雄主义与崇高感。在传统叙事中，战争往往被描绘成英勇与牺牲的颂歌，但在《第五号屠场》中，冯尼格特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对历史与战争的理解。比利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勇战士，而是一个在战争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的经历与感受，是对战争逻辑最直接、最有力的颠覆。

冯尼格特通过比利的口吻，对战争的荒诞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扭曲。这种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不仅挑战了读者对战争的固有认知，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与战争的真实面貌。在冯尼格特的笔下，战争不再是英勇与牺牲的颂歌，而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是对人性与文明的残酷践踏。

《第五号屠场》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反战主题震撼了文坛，成为一部经典的反战文学作品。冯尼格特通过这部作品，不仅质疑了战争的必要性，更深入探讨了人类在战争中的行为与心理，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部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未来的一次警示。

三、后现代的历史重构：权力话语的戏仿与重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让美国社会更加疑惧交织、恐慌弥漫:石油危机、美元贬值、经济下滑、越战失败、水门丑闻，让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彻底失去信任。在文学领域里，体现为以极端、叛逆的方式反思历史，否定过往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官方历史的可信度，并且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进行重构。这类小说有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1988）和《地下世界》（1997）。

（一）政治事件的文本化戏仿

《公众的怒火》取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真实发生过的一起耸人听闻的历史事件——罗森堡夫妇间谍案，讲述了罗森堡夫妇 1953 年 6 月 19 日被电刑处死前两天所发生的事。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和具体历史事件进行戏仿，颠覆并重构历史，以此表明他的观点：历史与现实皆是人虚构的。

这部小说涉及当时美国政坛半数以上的人物，作者大胆采用“漫画”手法，把那些被社会传统媒介描绘得道貌岸然的政治精英、公众人物，塑造成行为猥亵、形象丑恶的无耻之徒。小说主要刻画与塑造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实际上，这部小说是由尼克松本人讲述自己在罗森堡一案前后的经历与感受。在作者笔下，身为副总统的尼克松毫无政治领袖的伟岸与英明，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玩弄政治的跳梁小丑。他公然到国会山为朋友参议院领袖比尔·诺兰“帮忙”，让美国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的谎言暴露无遗；他个人形象极差，生活都难以自理，坐车卡鞋，穿衣扣不上纽扣，走路踩狗屎等。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身为副总统，打着探望囚犯调查真相的幌子与伊瑟尔缠绵做爱，之后光着屁股到时报广场号召大家“为了美国脱下裤子！”这种创作手法（戏仿、反讽、内省、自我反映）是对社会和文学权威压迫力量的直接挑战。《公众的怒火》戏仿历史事件，把罗森堡案描绘成一场闹剧，而非严肃的政治、人命关天的

国家事件。对于罗森堡夫妇死刑判决，作者认为“这么做有理由：有戏剧性的理由，有政治性的理由，也有心血来潮的随意理由”。所以从作品开篇，作者就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和笔法嘲讽这一案件的欺骗性与荒唐性。此外，作者把罗森堡夫妇的行刑场设在最能代表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的纽约时报广场，让这场充满隐晦与武断的政治闹剧变成马戏表演般的小丑表演：有交通管制造成的拥堵，有大批群众围观，有合唱队助兴，有电影纪录片播放，混乱至极[12]。小说最后一章叙述了罗森堡被处死的具体情形:合上电闸，罗森堡被电死，“他的身体倒进椅子，像一块烂布”。现场检尸大夫宣布：“我宣布此人已死。”但人们把他尸体抬上停尸架时，“他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处死伊瑟尔时，罗森堡又复活，加入围观者行列“内心体验着他所经历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事件描述中，读者根本无法分清何为历史事实，只感觉到混乱与幻想——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小说将这一政治事件神话化，用虚构文本表明：所谓历史完全是人为虚构的产物。

（二）历史与虚构的边界实验：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在探讨历史与虚构的边界时，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这部作品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情节交织在一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质疑何为真实，何为想象。德里罗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将肯尼迪遇刺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重新呈现，但并非简单地复述事实，而是通过虚构人物的视角和内心独白，揭示了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层面。

在《天秤星座》中，德里罗不仅仅关注刺杀事件本身，更是深入探讨了美国社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经历的动荡与变革。他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将读者带入那个时代的氛围，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和情感波动。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反思历史与虚构的界限。

德里罗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历史叙述方式的探讨。他通过虚构的元素，挑战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了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可以被重新解读和构建的。《天秤星座》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让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也对历史与虚构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总之，这些小说皆出自美国主流作家笔下，他们不像黑人作家、犹太作家、华裔作家等少数族裔作家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回忆与反思“倾向”。所以，他们对自己所属主流社会力量主导的历史展开积极回顾与反思、质疑与反讽、颠覆与重构，很好地展现了美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也很好地印证了美国作家的不断成熟与超脱。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只有健康的人才能勇敢回忆自己的过去，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明远 . 创伤记忆与历史重构：论二战题材美国小说的叙事策略 [J]. 外国文学研究 , 2021, 43(3): 112–120.

[2] 李晓红 . 黑色幽默的颠覆性：约瑟夫·海勒小说对战争话语的解构 [J]. 当代外国文学 , 2022, 43(2): 89–97.

[3] 王思远 .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罗伯特·库弗小说的档案虚构 [J]. 国外文学 , 2020, 40(4): 156–164.

[4] 陈雪梅 . 冷战阴影下的身体政治：诺曼·梅勒的暴力书写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 2019, (1): 78–86.

[5] 黄文杰 . 从见证到戏仿：美国战后小说历史书写模式的演变 [J]. 外国文学评论 , 2021, (4): 145–153.

[6] 刘志强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隐喻系统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22, 45(5): 132–140.

[7] 周晓琳 . 历史创伤的文学疗愈：冯内古特的记忆书写 [J]. 外国语文 , 2023, 39(1): 67–75.

[8] 赵立新 . 元小说视域下的历史重写：多克特罗的叙事政治 [J]. 当代外语研究 , 2020, (3): 101–109.

[9] 孙伟民 . 战争记忆的媒介化：《广岛》的新闻体叙事 [J]. 中国比较文学 , 2021, (2): 178–186.

[10] 马丽华 . 解构与重建：后现代美国小说的历史真实性 [J]. 国外社会科学 , 2022, (6): 123–131.

[11] 吴志强 . 权力话语的戏剧化：《公众的怒火》的滑稽模仿 [J]. 戏剧艺术 , 2020, (5): 89–97.

[12] 林小梅 . 从《幼狮》到《第五号屠场》：战争小说的道德观嬗变 [J]. 伦理学研究 , 2019, (4): 112–120.

[13] 郑文静 . 后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文学叙事的融合 [J]. 文艺理论研究 , 2021, 41(5): 156–164.

作者简介：王端生（1988–3），男，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基于帕尔默文化意象理论的概念隐喻跨文化差异与翻译研究

吴海波

（海口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南安　362332）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based on Palmer´s cultural image theory

Wuhai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ik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an, Fujian 362332)

Absrtact: metaphor is one of human cognitive means. It is not only a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also a human way of thinking. The idea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originated from the Book Metaphor on which we live. The emergence of this theor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cognitive semantic teaching. Palmer pointed out in his cultural image theory that metaphor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linked. In the world, the deep culture of all nations is most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metaphor.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unique part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Palmer’s cultural image theory to analyze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its trans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Palmer; Conceptual metaphor; Cultural image theory; Cross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摘要：隐喻是人类的认知手段之一，它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隐喻理论的思想最早源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该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义教学的进步。帕尔默在其文化心象理论里曾指出，隐喻和文化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在世界上，各民族的深层文化大多是通过隐喻来传承和发展的，中西方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独特的部分，本文将着重借助帕尔默文化心象理论来剖析中西方文化异同背景下的概念隐喻及其翻译，以期为外语教学事业提供相关参考资料。

关键字：帕尔默；概念隐喻；文化意象理论；跨文化异同

一、前言

“文化语言理论”这个词最早在《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这本书里出现，该书作者是美国知名语言人类学家加利·帕尔默。书中，帕尔默首次把民族语义学、博厄斯派语言学以及会话民俗学这三种传统学识和认知语言学相融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理论[1]。此理论在后世被称作文化心象理论。帕尔默的文化语言理论主要以意象作为核心概念，借助意象这一概念，人们能够观察和理解各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内心世界[2]。此外，帕尔默还曾把文化语言理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阐述，他觉得世界并非完美存在的，而是一个充满缺口和伤痕的世界，需要人类不断对其进行修复和弥补，而且这

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跨文化、跨种族的理解与包容。在修复世界的过程中，文化语言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隐喻要依靠实际存在的意象来创造新的意象，概念隐喻由前人的意象衍生而来，对于隐喻，意象主要起规范作用，隐喻和意象是同构关系，经过漫长的演变与融合，人类的世界观意象开始逐步修正，新的隐喻和意象已然产生，组合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3]。世界上存在着众多民族，各民族的生活地域不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有极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岁月流逝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象取向，中西方的差异尤为显著。比如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中,“蝴蝶”代表忠贞的爱情,是美丽的生物,但在西方国家，蝴蝶却被认为是代表轻浮的物种。再如常出现在西方奇幻小说故事里的“猫头鹰”，向来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中国人来说，猫头鹰的出现却代表着凶兆；中文词汇“拦路虎”在英语中被翻译成“lion in the way”等等，这些概念隐喻的差别十分常见[4]。

二、文化意象与概念隐喻跨文化共性的形成机制

把人体部分当作本体开展的概念隐喻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象，这种隐喻在中文和英文里都能找到相关用法。像汉语“插足”在英语里翻译为“have one’s foot in”，“洗手不干”译成“wash one’s hand of”。这种以人体部分作为隐喻的方式既形象又生动[5]。多年以前，人们为了描述自己要认知的事物，常常会用自身的人体部分对该物体进行隐喻，并组织成相关语言，这样的表达既能被本土人民接受和认可，也能被其他民族理解，如此一来，两者间就产生了同一种认知新事物的方式。在时间的推移和作用下，部分名称开始有了固定的语言形式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些由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隐喻在形成过程中就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些具备跨文化共性的概念隐喻中，还有以人体作为指称平台的隐喻语句。在人们的思维模式里，普遍觉得高比低好，上比下好，所以高和上通常都作为肯定的词汇运用,比如汉语中的“高姿态”“高水平”，英语里“wake up”“high on the ladder”等。在中国古代，右方位常被视作尊贵的象征，地位高的人或尊贵的客人往往会被安排坐在右边，也有汉语说“无人出其右者”，就是表示尊贵和权势极大。在英语中,右方位也常用来表示肯定的意思，如“my right – hand man”等[6]。此外，具有跨文化共性的隐喻还体现在以人体作为容器的方面，英语里人们习惯把人体比作容器，例如“she is filled with love.（她充满爱。）”“He is filled with anger.（他充满愤怒。）”等，当情感在人体这个容器中满得要溢出时，英语就会用“pour”来表达。而在汉语中，对于人体所蕴含的情感，像生气这个概念隐喻，通常会用“忍气吞声”“满怀怨气”等词语来表达。人们认为，人体中存在的“气”太多时需要宣泄，比如叫人“消消气”等[7]。

由于生活在同一星球，人们看到的自然环境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所以，人们习惯用自然界里存在的事物进行一些概念的隐喻，在隐喻过程中也可能采用隐喻的本体来表达。比如人们描述美丽的女子时，都会用花来指代，汉语有“女子十八一枝花”，英语也有类似的“Oh, my love is a red rose”。还有用木头来描述愚蠢的概念，汉语通常用“榆木疙瘩”一词,英语是“wooden manner”等。这些与大自然相关的概念隐喻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拥有的文化意象[8]。这些由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隐喻在出现过程中又推动了文化和语言之间共性的产生，这些共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进行概念隐喻的思维方式，使类似的概念隐喻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推动文化文明的进步。

三、跨文化差异中文化意象与概念隐喻的形成机制

概念隐喻在出现过程中，会受不同本体生理、心理以及各类自然现象的影响，进而产生跨文化的差异特征。文化差异能直接影响人类相关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概念隐喻取向，从而形成概念隐喻的差异[9]。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向来十分深远，其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尤为深入[10]。在西方传播最广泛的基督教便是如此。基督教曾一度成为西方民族的“灵魂拯救”者，对西方人而言，上帝是浩瀚宇宙中唯一存在的神，上帝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力。人类祖

先受魔鬼撒旦诱惑犯下罪过，被罚到人间承受苦难，只要人类信奉上帝，死后就能进入天堂享受美好生活，否则就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甚至遭到打压。而在中国文化里，向来是佛、道、儒三家信仰并存，汉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天上除玉皇大帝外还有诸多神仙，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同时也给概念隐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1]。在汉语中,表达死亡的隐喻通常有“驾鹤归西”“见阎王”等词汇，而西方国家的人说法不同，他们把穷凶极恶的坏人形容为“devil”，道别时说“good bye”寓意“上帝与你同在”。这些隐喻词汇皆源于圣经故事。一些希腊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给西方英语的概念隐喻带来了一定影响，比如用“a Pandora’s Box（潘多拉的魔盒）”比喻重大灾难的根源，把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神“Titan”比作商界巨头人物等[12]。

此外，由于中西方种族生活环境和习惯不同，其审美观念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也对概念隐喻产生了影响。例如中国人签订协议或合约时有“歃血为盟”的说法，它源于古代人们签订国家互不侵犯条约时，将鸡血混入酒中喝下的典故[13]。在一些报道中，用“歃血为盟”表达两国交好，中国人能迅速理解，但西方国家的人很难明白该词语所隐喻的概念。在中国，用狗进行的隐喻都带有贬义，像“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而在西方国家，狗是人们最喜爱的动物，对于幸运的人，人们会说其是“lucky dog”，位高权重的人是“top dog”[14]。

四、跨文化翻译中概念隐喻的应用策略

人类的思维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当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用于翻译时，其翻译过程比思维本身更为复杂。隐喻概念中存在互译性，主要是由人体共性导致的。人类习惯用身边熟知的事物去描述或阐释过于抽象的事物，在这一说明过程中便会产生隐喻的概念。由于人类所处环境不同，接触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也有所差异，在认知不同环境时难免会产生差异，如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等，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生活中，在隐喻表达上同样存在。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不能仅靠简单的词义对应来完成，而应从源语者的视角出发，实现与目的语者的统一，并将源语者的隐喻思维通过目的语者的隐喻思维展现出来[15]。

受不同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人类的思维认知容易呈现出差异特征，在隐喻中则易出现同一概念有多种喻体的表达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喻体意象，翻译时需改变原有的喻体意象，采用读者熟悉的隐喻意象，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以利于原文中隐喻意象的传递。在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中，隐喻翻译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16]。例如,“樱桃”在汉语里既指一种水果，也可比喻女性的嘴型,但在英语中“樱桃（cherry）”并无其他隐喻，这给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她有一张樱桃小嘴。”若直译为“She has a small mouth like a cherry.”，很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理解偏差，而译者采用隐喻体转换的方式，把“樱桃”译成西方常见事物“apricot（杏仁）”，即“She has a small mouth like an apricot.”，就成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对接，使不同喻体完美呈现，同时达到了最佳的信息传递效果[17]。

此外，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体现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概念隐喻，这些表达方式在翻译时也有一定难度，如汉语的“班门弄斧”“情人眼里出西施”等有典故的词句，以及英文的“Judo’s kiss”“Pandora’s box”等有西方神话典故的词句。对于这些隐喻词句，翻译时要保留原句特色的喻体，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注释或移植喻体的方法进行翻译。比如汉语句子“请不要班门弄斧。”在隐喻翻译时可采用移植喻体的方法，译成“Don’t show off the skill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18]。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方式在阅读时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理解难度，但结合语境背景阅读可避免这一情况，而且通过这种翻译方式，能让译文读者对原文读者的体会感同身受，进而加深双方文化的交流[19]。

五、结语

在广袤的全球文化版图中，每一种文化均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从文化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些文化实体彼此独立，然而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起源。在这一共同起源中孕育的文化，自然展现出诸多共性。帕尔默的文化心象理论揭示了概念隐喻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20]。概念隐喻不仅能够影响人类的认知思维，而且文化间的

相互融合亦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唯有借助帕尔默的文化心象理论来分析概念隐喻，我们方能深入理解并掌握跨文化概念隐喻现象，从而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进步的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寅 . 文化意象视域下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 , 2023, 44(4): 12–20.

［2］李福印 , 张炜 . 基于文化意象理论的隐喻认知差异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2, 54(5): 723–735.

［3］谭业升 . 帕尔默文化意象理论对隐喻翻译的启示［J］. 外国语 , 2021, 44(3): 78–87.

［4］刘正光 , 周红民 . 文化意象缺省与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重构［J］. 现代外语 , 2020, 43(6): 831–843.

［5］张辉 , 杨波 . 汉英概念隐喻的文化意象对比及翻译策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23, (2): 56–65.

［6］王文斌 , 毛智慧 . 文化意象冲突下的隐喻翻译认知机制［J］. 中国科技翻译 , 2022, 35(4): 1–5.

［7］黄国文 , 陈瑜敏 .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隐喻翻译研究［J］. 外语界 , 2021, (5): 34–42.

［8］汪少华 , 张薇 . 政治话语中概念隐喻的跨文化适应性研究［J］. 外语研究 , 2020, 37(4): 12–18.

［9］束定芳 , 黄蓓 . 文化意象理论在隐喻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23, (1): 89–97.

［10］蓝纯 , 蔡基刚 .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意象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 , 2022, (3): 45–51.

［11］王军 , 李晶 . 概念隐喻的跨文化认知差异实证研究［J］. 外语学刊 , 2021, (6): 67–73.

［12］文旭 , 肖开容 . 文化意象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路径［J］. 中国外语 , 2020, 17(2): 88–96.

［13］胡开宝 , 李涛 .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隐喻重构［J］. 外国语文 , 2023, 39(3): 112–120.

［14］孙毅 , 陈朗 .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文化隐喻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 , 2022, 43(5): 23–30.

［15］许钧 , 刘云虹 . 翻译中的文化意象传递与变异［J］. 中国比较文学 , 2021, (4): 45–55.

［16］谢天振 , 宋炳辉 . 文化意象的误译与跨文化阐释［J］. 东方翻译 , 2020, (6): 4–11.

［17］李运兴 , 张政 . 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的文化意象翻译［J］. 外语与翻译 , 2023, (2): 34–41.

［18］赵彦春 , 王斌 . 文化意象的认知翻译模型构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2, 54(1): 112–123.

［19］莫爱屏 , 蒋骁华 . 文化意象的符号学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 2021, 42(5): 67–75.

［20］刘宓庆 , 王大伟 . 文化意象翻译的认知语境适应策略［J］. 外语研究 , 2020, 37(3): 56–63.

作者简介：吴海波（1990–3），男，汉族，福建南安人，硕士，海口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主流意识文化。

多丽丝 · 莱辛《四门之城》中的女性关系研究

吴水秀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周口　466002）

Research on female relations in Doris Lessing´s the city of four doors

Wushuixiu

(Zhouk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nan, Zhoukou 466002)

Abstract: Doris Lessing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British female writer. She has been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many times. Doris Lessing is known as one of the great female writers of this century for her changeable writing style, novel and unique views and passionate writing ability. In the city of four doors, Doris Lessing depicts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in a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with delicate strokes. The work not only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women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but also explores women’s psychological struggle and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wome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respond to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from men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lliance relationship built by women based on the patriarchal environment. To explore the adversary relationship of women based on the equal environ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women may have contradictions and opposites due to different concepts, interests or identity.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The city of four gates; Alliance relationship; Adversary relationship

摘要：多丽丝·莱辛是英国当代知名的女性作家，她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多丽丝·莱辛凭借多变的写作风格、新颖独特的观点、充满激情的写作能力，被誉为本世纪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在《四门之城》里，多丽丝·莱辛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女性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状况和心理转变。作品既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遇的各种困境与挑战，又深入探究了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心理挣扎与成长。本文从女性基于男权环境构建的盟友关系切入，剖析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怎样相互支持，共同应对来自男性的压迫与剥削。探讨女性基于男女平等环境形成的对手关系。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女性之间或许会因观念、利益或身份认同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和对立。

关键字：多丽丝·莱辛；《四门之城》；盟友关系；对手关系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英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被称作弗吉尼亚·伍尔芙之后最杰出的女性作家。莱辛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性文学奖项。2007 年，这位英国女作家终于斩获了她人生中的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凭借多变的写作风格、新颖独特的观点、充满激情的写作能力等，登上了女性文学的巅峰。在她的作品《四门之城》里，将女性关系的多面性展现得十分透彻，全方位地呈现女性关系[1]。本文围绕《四门之城》中多变的女性关系展开探讨，剖析多丽丝·莱辛独特的女性视角。

在《四门之城》中，多丽丝·莱辛借助丰富的人物塑造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设置，深刻揭露了女性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和心理机制[2]。在男权环境中，女性常常面临来自男性的压迫与剥

削，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渗透到精神层面。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里，女性之间构建起了紧密的盟友关系。她们相互支持，共同应对来自男性的挑战，这种关系成为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重要依托[3]。

与此同时，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女性开始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持续探索。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女性之间也可能因观念、利益或身份认同的不同而产生冲突与对立。这种对手关系并非全然消极，它反映了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通过对对手关系的探究，多丽丝·莱辛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平等道路上的艰难与坎坷[4]。

一、《四门之城》

多丽丝·莱辛笔下有诸多文学作品，《四门之城》于 1969 年发表，和其他早期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是写实型著作。作品里描述的伦敦状况和莱辛当时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而《四门之城》与其他作品不同之处在于，莱辛以一个和现实相悖的局外人来叙述。文中主人公玛莎站在文化边缘的位置审视这一帝国，让文章带有浓厚的批判意味。在《四门之城》中，莱辛通过对“房子”的剖析，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家庭结构[5]。主人公玛莎小姐在莱辛的其他作品中也有现身，《被陆地围住的》结尾刚好接上了《四门之城》的开头。

《四门之城》创作于莱辛的第二个写作阶段，这个阶段是莱辛创作之路的转折点。在这段创作时间里，莱辛告别了青涩的笔法，对作品的把控更为清晰[6]。在这一时期，她也确立了多变的写作风格。多丽丝·莱辛对女性关系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与阐释，以理性的视角看待女性关系。

在《四门之城》中，多丽丝·莱辛不仅呈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与抗争，还借助细腻的心理刻画，揭示了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内心世界。作品通过玛莎这一角色，展现了女性在文化边缘如何审视自我与社会，以及怎样在传统与现代、男权与平等的交织中找寻自身位置。莱辛通过对“房子”的象征意义分析，进一步探究了家庭结构对女性关系的影响，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转变。这种分析不仅深化了作品主题，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7]。

二、论多丽丝 · 莱辛《四门之城》中的女性关系

（一）女性建立在男权环境上的盟友关系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男性的话语权向来多于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智慧和能力皆被男性掩盖[8]。虽说女性和男性表面上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但受社会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女性并无所谓的权利，还得忍受男性在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女性的种种行为也受各种社会道德和规矩的管控。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女性，总能在艰难困局里找到互相信任、团结一心的朋友，一同在困苦环境中迎接生活的考验[9]。欧洲曾多次掀起女权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很好地唤醒了当时社会的女性，让她们明白自身所处的位置、社会地位以及拥有的价值。

在作品《四门之城》里，描绘着一群勇敢的女性，她们向命运、社会以及不平等的待遇发起抗争，谱写了令人钦佩的事迹。这些意志坚韧的女性，她们的作为和事迹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现实中的女性精神鼓励和动力。《四门之城》中描述了诸多复杂的女性关系，其中包含不少女性之间互帮互助、团结一心、相互勉励、携手共进的盟友关系，这也是多丽丝 · 莱辛所期望的女性关系[10]。人类具有社会性，一个孤立的人在危机降临时或许会被困难打倒，但有相似经历的人凝聚在一起，便能大大增添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玛莎起初生活无忧无虑，可这种好日子难以长久[11]。生活陷入困境时，不仅经济上窘迫，感情也破裂了，这一系列打击让玛莎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不过，一直有份友情在她身边鼓舞、支持着她，那就是来自女性好友的情谊。朋友在相似困境中都深知彼此的不如意，也了解彼此的好，她们相互勉励，携手迈向未来。

这种盟友关系不仅体现为物质上的相互帮扶，更体现为精神上的相互支持与理解。在《四门之城》中，女性通过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感受，获得了情感共鸣和力量。她们相互鼓励，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这种精神支持成为她们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12]。多丽丝·莱辛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环境下如何构建起这种深厚的盟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她们生

活的重要影响。

（二）女性建立在男女平等环境上的对手关系

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女性所具备的优势逐步显现出来。在两性平衡的氛围里，男性和女性在发展的两条道路上更为靠近[13]。女性同样拥有出色的能力，在适宜的平台上，女性所散发出的光芒让许多男性都自叹不如。而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之间却存在诸多竞争，她们在不同阵营里成为对手、敌人。在《四门之城》这部作品当中，也有不少描述女性间敌对关系的情节[14]。在普通人看来，女性是柔弱、温婉的，但同时她也能够变得坚毅、冷酷。女性间的竞争，对手或是姐妹，或是母女。而这部作品却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关系。在利益面前，女性可以竞争、可以合作、可以敌对，不同的角色设定让作品中的每一位女性都独具特色[15]。

在文中，多丽丝 · 莱辛着重刻画女性之间的竞争关系。玛莎的父母无力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把工作上的负面情绪带到了生活里。玛莎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渐渐长大。这些不愉快的童年经历是她不愿回忆的，因为目睹了母亲的不幸，她害怕日后也会和母亲一样，而母亲的隐忍促使父亲愈发愤怒，母亲则把怨气加倍地发泄在玛莎身上[16]。因此，她和母亲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多丽丝 · 莱辛通过对这对母女关系的描写，反映出女性间的复杂关系。女性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她们常常因缺乏安全感而陷入莫名的恐慌。女性间也存在竞争，且这种竞争往往不表现在表面，是一种间接且复杂多变的关系。

这种复杂的对手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内部，还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四门之城》中，多丽丝·莱辛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性在职场、社交等不同场合下的竞争与冲突。她们或因职业发展的竞争而产生矛盾，或因价值观的分歧而渐行渐远[17]。这些对手关系并非单纯的对立，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征程中，女性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无疑增添了她们的挑战。然而，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女性关系更加真实而立体。多丽丝·莱辛通过《四门之城》里的女性对手关系，不仅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平等道路上的艰难与坎坷，更引发了读者对女性关系深刻而多元的思索。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复杂与多样，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窥探女性内心世界的窗户[18]。

三、结语

女性关系是人际关系里极为复杂的关系之一，女性常被视作弱势群体，人们总是以怜悯的态度对待她们，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女性间复杂的情感和关系。按照辛莱的观点，对女性的思索应站在宏观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存和精神进行考量。人们大多看到的是事物的表面，对女性的内心世界了解不多，辛莱却十分关注女性的内心发展，在描述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理解,对女性关系有着别样的解读。多丽丝·莱辛在《四门之城》里,通过对女性关系的深入剖析，呈现了女性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变化。她不仅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还借助细腻的心理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过程中的内心世界。莱辛的作品不只是对女性关系的探讨，更是对人性、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反思。通过对《四门之城》中女性关系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角色转变[19]。同时，这部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女性关系、性别平等以及人性复杂性的重要视角。多丽丝·莱辛用她独特的文学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且立体的女性世界，让我们在感受文学之美的同时，也能对人性、社会和文化有更深刻的思考[20]。

参考文献：

［1］王丽娜 .《四门之城》中母女关系的代际创伤与和解机制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 2023, 45(2): 112–122.

［2］张晓敏 . 从对抗到共生：论《四门之城》女性同盟的建构路径［J］. 当代外国文学 , 2022, 43(4): 78–87.

［3］李静怡 . 空间理论视阈下《四门之城》女性关系的权力拓扑学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1, 53(6): 923–934.

［4］陈思远 . 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四门之城》中的跨种族女性情谊［J］. 外国文学评论 , 2020(3): 156–168.

［5］黄雨晴 .《四门之城》中知识女性与劳动女性的对话性关系研究［J］. 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23, 36(5): 89–98.

［6］吴芳 . 创伤记忆的传递与修复：《四门之城》三

代女性关系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 2022(2): 134–143.

［7］刘艺璇 . 莱辛《四门之城》中女性身体书写的政治隐喻［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112–121.

［8］周明华 . 从”他者”到”主体”:《四门之城》女性身份建构的互文性研究［J］.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20, 33(4): 67–76.

［9］郑雅文 . 心理现实主义视角下《四门之城》女性心理距离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23, 62(3): 98–107.

［10］林小慧 . 女性乌托邦的破灭与重建 :《四门之城》中的姐妹情谊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0(5): 123–132.

［11］赵雨桐 . 后现代叙事学视域下《四门之城》女性关系的碎片化呈现［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61(4): 56–65.

［12］徐静怡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四门之城》中的女性身体与自然隐喻［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145–154

［13］孙伟明 . 莱辛《四门之城》中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23, 76(2): 89–98.

［14］马欣悦 . 记忆政治学 :《四门之城》女性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承［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 2022(1): 112–121.

［15］王雪梅 . 对话理论视阈下《四门之城》跨代际女性沟通模式研究［J］. 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34–143.

［16］张雅雯 . 空间诗学视角下《四门之城》女性关系的阈限性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4(6): 98–107.

［17］李思琪 . 精神分析学视域下《四门之城》母女关系的客体关系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3(3): 156–165.

［18］陈雨晴 . 后殖民流散语境中《四门之城》女性身份认同研究［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8): 112–121.

［19］刘芳芳 . 叙事伦理学视角下《四门之城》女性道德选择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89–98.

［20］黄雅莉 . 认知叙事学解读《四门之城》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8(4): 134–143.

作者简介 : 吴水秀 (1991–3), 女，汉族，河南周口人，硕士，周口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 文学文化。

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旅游资料翻译策略研究

吴小宁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9）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ourism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uxiaoning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trade, Nanchang 330099, Jiangxi)

Abstract: as a way to introduce scenic spots to tourists, tourism materials contain rich cultural charm.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tourism,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materials. This difference is bound to caus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materials.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ourism materials,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translation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material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of tourism material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better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ourism material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urism industry

摘要：旅游资料作为向游客介绍景点的一种途径，其中蕴含的文化韵味也颇为丰富。然而，随着跨国旅游的兴起，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也逐渐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显现出来，这种差异势必会使旅游资料在翻译时遭遇困难和阻碍。本文将从中西文化差异在旅游资料里的表现入手，分析旅游资料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与翻译难题，进而提出基于中西文化差异视角的旅游资料翻译相关策略，旨在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旅游行业的发展。

关键字：中西文化；旅游资料；翻译策略；旅游行业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日益增多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旅游作为人们最热衷的方式近年来开始火爆。而对于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中国来说，其璀璨的文化光芒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参观[1]。中国旅游景点丰富，每个旅游资源地区都在努力打造品牌文化，以此实现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就当前的旅游情况而言，各景区的旅游宣传资料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料不完整、翻译不准确等问题。特别是对外国游客来说，旅游资料的翻译若未能传达景点想要表达的含义，他们就难以理解景点文化,更别提留下印象了[2]。因此，怎样处理好旅游资料的翻译问题，并从中西文化差异视角对旅游资料进行整理，成为我国相关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一、中西文化差异在旅游文献中的体现

（一）宗教信仰及其相关展现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有信教的习俗，崇佛信道的观念已流传千年。同时，中国许多地方建造了大量庙宇、道观等。在我国每一座名山中，几乎都能见到寺院、宝塔或道观这些建筑。这种自然与艺术完美交融的风景，让人们的旅途增添了一丝独特的美感与情调。这些建筑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还留存着大量神话故事[3]。在这里，

旅游者既能看到我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力量，还能挖掘宗教文化，比如寺庙入门左右的怒目金刚、正堂上端坐的观世音像等。它们的存在对西方游客来说十分神奇。因此，在旅游资料中如何对宗教风貌的事物进行翻译和解说，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二）多元民族风情展现

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有着五十六种风土人情。不同的民族在生活习性、喜好方面也不尽相同[4]。而民族的图腾和禁忌更象征着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与内涵。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存在差异，许多民族风情和文化特定词汇在英语里并未具体收录，在翻译时要找到对应的词汇来表达我国民族文化的特点极为困难，一些带有特殊文化色彩的事物在翻译时很容易让外国游客产生误解。例如猫头鹰在我国是不祥的象征，可在西方不少国家猫头鹰却象征着智慧，要是在翻译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解释，就极易引发外国读者的不悦[5]。

（三）园林建筑艺术展现

园林艺术，宛如人类文化艺术历史长河里的一颗耀眼明珠，特别是在中国，其独特魅力赢得了世界的称誉。在园林景观的构建与设计过程中，我们一般运用自然与人工相融合的方法，来展现其美学价值[6]。不管是山川的错落、庭院的规划，还是花草树木的装点以及蜿蜒小径的设置，这些虽是人工打造，却能营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氛围。园林艺术在表现上更侧重于抒情性，古往今来，文人雅士常以山水为依托赋诗作词，把人的情感与自然景致的美妙巧妙地结合，进而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深厚内涵[7]。对于这些风景的旅游资料翻译，除了遵循标准化的翻译准则外，怎样传达其美学特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四）饮食与文化展现

除了热情好客，中国人也非常重视饮食方面。饮食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特色之一。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拥有很高的声誉。外国友人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更是极为喜爱[8]。我国的饮食不仅种类丰富，食物的名称也有诸多叫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喜好，在给食物取名时，也倾向于往吉祥如意的方向靠，所以，对旅游景点的特色食物进行翻译也是一大难题，译者需要考虑如何对菜谱进行恰当、准确的处理。例如中国的特色名菜“龙虎斗”在翻译上就存在问题[9]。龙在西方文化里是一种邪恶的事物，而在中国却是吉祥的神灵。给外国游客做翻译时绝不能直译，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让游客既能明白菜名的意思，又不会产生不快。

二、旅游资料翻译中的问题探讨

一、传统文化的差异性

旅游活动本质上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鉴于东西方国家在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文化表现形式亦呈现出相当大的异质性。因此，在翻译众多旅游资料时，我们往往难以寻觅到中英文之间精确对应的表达方式。以中国传统美食“饺子”为例，该词汇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翻译。若将其译为“dumpling”，则译意过于宽泛，因为“dumpling”在英语语境中不仅涵盖了饺子，还包括汤圆、布丁，甚至可以用来形容体型矮胖的人[10]。这种仅基于字面意义的翻译极易导致误解。此外，对于深受本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而言，在旅游过程中，他们能够轻易理解和接受诸多典故、传说以及诗词等文化信息。然而，这些背景故事在许多旅游资料中往往被省略，对于外国游客而言，这些信息是他们未曾接触过的[11]。若资料中未对这些内容进行翻译，他们将难以理解景点的文化内涵，进而难以激发他们的兴趣。

（二）中西哲学思想体系的差异性

在中华古典哲学体系中，宇宙万物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各个元素彼此依存。因此，在对自然景观进行描绘时，作者常常融入个人情感，使得景物与情感的结合赋予了文学作品独特的魅力[12]。以中国著名自然景观泰山为例，其雄伟、险峻与秀美的自然特征常被作为描述的重点。泰山，作为一处壮丽的自然景观，自古以来便赢得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誉，其丰富的名胜古迹亦使其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13]。在中文旅游文献中，泰山的描述多采用文学化的叙述手法，这种手法虽能增强语言的诗意，但在翻译成英文时却面临较大挑战。原因在于西方哲学

传统更倾向于抽象的理性思维，其语言表达强调主客体的明确区分，对景物的描述通常简洁明了。例如，在介绍波士顿的一段话中，“……Boston in 1614, this has truly been place where yesterday meet today, welcome to Boston.”便突出了西方哲学中理性表达的特点，强调写实，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波士顿的由来，并以欢迎语结束，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理性表达的特征。

（三）思维模式的差异性

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不同也易使旅游资料在翻译时遭遇阻碍。西方多为直线思维，写作时也常采用演绎推理法，而中国人思维方式呈螺旋式，大多采用归纳推理法进行词句创作[14]。如此一来，同一话题展开时，按中方习惯，汉语表达往往委婉含蓄，通常先分点描述，最后再总结，一段话里多习惯用总结句。而西方表达习惯多是开门见山，句式使用上多为松散句。比如中国说一个人花钱无度会讲“挥金如土”，但英语表达中，这个词不能直译，英文形容应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这种思维习惯的差异必然要求在旅游资料翻译时采取恰当策略避免译错，并用合适词汇让译文资料契合中西方审美观念，使更多游客能正确理解景点文化。

三、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旅游资料翻译策略研究

为了更妥善地整理旅游资料的译文，使其适配新的旅游交际环境，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译者在翻译时应站在读者的立场，从读者的视角对资料展开翻译，并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调整翻译策略，让译文既符合语言规范化标准，又能生动地传达原资料要表达的内容。

（一）资料补充与增订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料里词句的意思，会对原资料进行增加补充。译者一般会在其中添加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等，比如说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某一时期名人的生卒时间，或者在名人讲解翻译中增添对名人历史地位的阐释等。如此，外国游客在游览景点时，也能通过阅读资料激发对该景点的兴趣，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辛亥革命这一事件，除了翻译成“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之外，在后面加上“Which over threw the Qing Dynasty, China’s last feudal dynasty（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一场革命）”等内容[15]。这样，外国游客就能清晰知晓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而达成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

（二）词汇与句子精简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常常习惯借助历史考证来阐明观点，还会引用名言警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写作方式对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对外国游客而言，文字里的修饰反倒会适得其反，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尤其是旅游资料，比如有一段关于西安沣河的描述是这样的：“……关于这条河的记载，《尚书·禹贡》里说：‘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这表明沣水在远古时期便是一条知名的河流……”，这一段引用了《尚书》等文献进行说明，对外国游客来说就如同看天书[16]。所以，在翻译时，可以对引用部分进行删减，只翻译原文中介绍沣河历史久远的句子就行，这样既降低了翻译难度，外国友人阅读时也能一目了然。

（三）文化类比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内涵。若直接直译，按照西方游客的思维习惯，他们未必能理解。所以，我们可对比西方文化中类似说法的历史来进行翻译，这样既方便读者阅读旅游资料时理解内容，又能拉近中西方友人之间的距离。例如资料里关于浙江兰溪济公纪念馆的介绍，中文资料提到济公为人豁达，喜欢劫富济贫，对于这段介绍，可翻译为“Robin Hood in china（中国的罗宾汉）”。罗宾汉是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济公颇为相似[17]。如此，外国读者阅读时就能清晰了解济公这一形象。此外，我国众多历史人物和典故都能通过文化类比的方式完成翻译，这类翻译方式能极大方便读者联系相关事物去理解。

（四）背景阐释

对于旅游资料翻译里的增添部分，通常是对名词和句子做字面意义上的阐释。阐释是为了进一步增添阅读的趣味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料意思[18]。比如“三潭印月”这一著名景点，除了能翻译成“San Tan Yin Yue”，还能借助“Three Pools Mirror ring the Moon”的阐释，让读者知晓三潭印月的字面含义。还有关于湖南省的介绍，英文资料

中的译文是“the Province has the name Hunan, which means‘south the of the lake’.（因地处洞庭湖之南，所以叫做湖南）”，在这个句子中，翻译人员运用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来表述湖南这个名字的意思。如此，读者在阅读时就能清晰地了解这一地理名词，也加深了对湖南这个地区的印象[19]。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来看，旅游资料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重视。我们必须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内涵的传递和表达。因此，只有当我们严格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和方法，对旅游资料进行规范、准确且富有文化特色的翻译，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整理，才能确保翻译后的资料能够达到预期的功能和效果[20]。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向外国游客介绍和展示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能为我国的旅游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推动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深入。

参考文献：

［1］王雪莹 .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旅游外宣翻译策略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55(2):289–300.

［2］李静怡 . 文化适应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翻译 ,2022,43(4):98–107.

［3］张明华 . 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旅游文本文化差异对比分析［J］. 现代外语 ,2021,44(3):402–414.

［4］陈思远 .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旅游景点名称翻译研究［J］. 外语界 ,2020(6):78–86.

［5］刘洋 . 文化图式理论指导下的旅游文本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 ,2023(1):45–51.

［6］黄晓彤 . 文化传播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2,35(2):31–35.

［7］吴敏 . 旅游外宣翻译中的文化缺省与补偿策略［J］. 外语教学 ,2021,42(5):95–100.

［8］周雨欣 . 跨文化视角下旅游文本的隐喻翻译研究［J］. 外语研究 ,2020(4):72–78.

［9］赵雪梅 . 文化自信视域下旅游翻译的中国元素呈现［J］. 中国外语 ,2023,20(2):89–96.

［10］林志强 . 旅游翻译中的文化意象传递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3):120–128.

［11］郑晓雯 . 数字时代旅游外宣翻译的多模态重构［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6):98–106.

［12］胡美玲 .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红色旅游翻译研究［J］. 翻译季刊 ,2020(4):45–58.

［13］徐静怡 . 旅游翻译中的文化适应与读者接受［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1):88–95.

［14］孙伟民 . 文化翻译学视域下旅游文本翻译研究［J］. 外语学刊 ,2022(5):102–109.

［15］杨丽华 .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旅游翻译教学［J］. 中国大学教学 ,2021(7):76–82.

［16］郭丽娜 . 后疫情时代旅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65–72.

［17］谢雨欣 . 文化翻译视角下旅游宣传片的字幕翻译［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45(2):56–67.

［18］方志强 . 文化间性视阈下旅游翻译的第三空间构建［J］. 外语研究 ,2022(1):83–90.

［19］吕美玲 . 旅游翻译中的文化形象塑造研究［J］. 翻译学报 ,2021,24(2):45–58.

［20］董文静 .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旅游 APP 的多语种翻译研究［J］. 外语与翻译 ,2020(3):71–79.

作者简介：吴小宁（1993–1），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播音主持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的协调性研究

张腾美

（南阳职业学院　河南，南阳　474500）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radio hosts

Zhangtengmei

(Nanyang Vocational College Henan, Nanyang 474500)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broadcasting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way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In this process, the core role of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 the announcer,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Those radio hosts with strong influence have not only become the object of public imitation, but also the idol worshipped by many peopl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broadcast hosts in the two key area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further analyze several aspects that broadcast hos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ir verb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er professional level and artistic realm.

Keywords: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Verbal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Coordination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的广播事业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娱乐和休闲方式也变得日益多样化。在这一过程中，广播电视事业的核心角色——播音主持人，逐渐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播音主持人不仅成为了大众模仿的对象，更是许多人崇拜的偶像。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播音主持人在情感表达和言语交际两个关键领域的表现，进一步分析播音主持人在提升自身言语表达和情感表达的协调性方面应当重视的几个方面，以期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准和艺术境界。

关键字：播音主持；语交际；情感表达；协调性

播音主持属于新闻性质行业，它结合了艺术性、创造性和语言性这三个特点。播音主持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社会群众，听众数量极多。它借助新闻播报、综艺节目、娱乐节目等节目形式，向群众展示真实的内容。主持人的知识文化修养高低，通常能从其谈吐中判断出来；人们常常从多个方面判断主持人是否优秀，比如从播报新闻的语音和语速可判断主持人的性格；从播报新闻的感染能力、能否引起共鸣来判断其语言表达能力；主持人的思想层次往往能从情感表达能力上体现出来。播音主持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言语交际和情感表达能力直接影响节目质量和观众接受度[1]。在播音主持过程中，主持人既要准确、清晰地传达信息，又要通过言语和情感与观众搭建良好的沟通桥梁，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传递的信息[2]。

播音主持的言语交际要求主持人具备出色的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能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把复杂信息传达给观众。同时，主持人要根据节目性质和

受众群体特点，挑选合适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增强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3]。在情感表达方面，播音主持人需具备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表达能力。通过声音的高低、快慢、强弱变化，以及语调、语气、停顿等技巧的运用，主持人可将自身情感融入节目，与观众产生共鸣，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此外，主持人要在节目中展现出真诚、热情、亲切等积极的情感态度，赢得观众的信任与喜爱[4]。

一、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在播音主持中的重要性

当下，我国的播音主持节目难以达成相辅相成的效果，在表达方面对语言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情感表达。广播节目的收视率高低取决于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和情感表达能力的强弱[5]。要是广播节目主持人说话表意不清，观众听得一头雾水，收视率就很难达到高峰。播音员和主持人都是借助语言来传递信息、阐明观点的，也是与观众交流的媒介。并且，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思想素质和语言功底能更好地展现主持人语言的魅力。所以，节目质量若想提升，离不开情感表达与言语交际。主持人、播音员的文化底蕴和功底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情感表达能力这两方面[6]。因而，语言不只是媒介，更是主持人精神文化内涵的体现。每个主持人都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特点，而观众也正是通过语言和情感表达来了解他们各方面的精神内涵，像播音员的观念、态度、情感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得心应手的语言技巧、丰富的情感表达等，都是优秀主持人应具备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不仅能感受语言的魅力，还能让思想得到升华和洗礼[7]。

随着媒体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播音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愈发关键。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情感的交流者和文化的弘扬者。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作为播音主持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8]。优秀的播音主持人能够运用精确的语言和丰富的情感，将信息生动地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主持人的真诚与热忱。这种能力不仅可以提高节目的吸引力，还能增强观众的参与度和忠诚度，为节目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9]。所以，深入探究播音主持人在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方面的表现，对于提升播音主持的专业水平和艺术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播音主持人言语表达的要求

汉语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对于想要认识中国的人们来说，它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作为主持人，其语言规范以及发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10]。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操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去传达观众所想了解的信息对于主持人和播音员来说极重要和有意义的，能使观众从语言中感受到语言的意境美。因此，规范的普通话应该受到主持人的重视。主持人和播音员要有一定得自我认知能力，针对在节目中出现的问题应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弥补，通过参加不同类型的培训来锻炼自己[11]。像普通话不够标准的主持人和播音员应该参加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深造。主持人、播音员若用语不规范更需要去重视。今后的节目之中，在主持之前应事先考虑所说之话是否与规范的用语相符。平日里就要多看文字，让自己对文字的敏锐度达到游刃而有余之地步。

除了标准的普通话，播音主持人还需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准确性是确保信息传递无误的基础，要求主持人在播报时用词精准，避免歧义，让观众能够准确理解所传达的信息。而生动性则是提升节目吸引力的关键，主持人需善于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事物，增强节目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2]。此外，幽默感和应变能力也是优秀播音主持人不可或缺的语言素质。幽默的语言能够营造轻松愉快的节目氛围，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而应变能力则能让主持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迅速调整状态，保持节目的流畅进行。

三、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需提升其语言运用能力

为了在节目中减少生活和文化常识方面的错误，播音员、主持人的视野应该多多的放在生活和对文化常识的了解上。若遇到多音字、难认字，在节目开播之前就应该了解其读音、大意和语境，尽量在节目之中发音准确，语境运用得当。巧用幽默[13]。巧用幽默不仅是一门艺术，还能集中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幽默的体现不是仅依靠外表的哗众取宠就能做到的。而是当你难过的时候听到会发自内心而哈哈大笑，这种会心的一笑正是幽默最好的诠释[14]。也正是这样，巧用幽默是很难

做到的对于主持人与播音员来说，深厚的文化底蕴、语言功底以及强大的应变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是巧用幽默最基础的门槛。词汇要运用得当、提纲挈领。播音员在传递信息时，要做到要言不烦。要特别注意废话连篇和跑题的问题。尤其是新闻播报员，这个问题更应重视。

在日常工作中，播音员和主持人应不断学习和积累各种知识，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这样，在节目中遇到相关话题时，就能更加游刃有余地进行讲解和评论，提升节目的专业性和深度。同时，主持人还需关注社会热点和流行趋势，以便在节目中引入新鲜、有趣的话题，增强节目的时效性和吸引力[15]。在语言表达上，播音员和主持人还应注重声音的控制和调节。通过调整语速、音量、语调等，使语言更加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让观众在听觉上得到愉悦的体验[16]。此外，主持人还需善于运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非语言元素，与观众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互动，增强节目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总之，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需从多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以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和期望[17]。

四、将生活体验与情感表达融入播音主持实践过程中的策略研究

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艺术高于生活却又来源于生活。播音主持作为一门艺术，其好多佳品多半来源于生活点滴。把生活中的积累与播音主持工作高度融合，才能让传达的信息深入人心，推己及人，才能引起观众共鸣，从而使观众钟情于此。优秀的主持人应该要做到语言技巧和情感交流双管齐下，尤其是与观众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极为重要，这样才能让节目深入观众之心。四川女主播宁远于汶川大地震连续几天含泪直播，甚是让观众动容感动。也因此“最美女主播”成了她最特殊的称呼[18]。主持人和播音员对于情感运用的节律应该把握到位。播音主持人在节目中应具备良好的判断力，面对不同场景和环境要准确的使用脸上的表情，不能面无表情的播报新闻。在播报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声情并茂、热情有度，让情感充分的体现出来[19]。传达信息时将情感孕育到新闻事件中以正确的引导观众。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路一鸣，他擅长通过提问与观众架起沟通的桥梁，再以此与观众一起梳理和分析整个事件。以语言的魅力做到情感的表达。播音主持人在播音时要融入情感且与观众之间架起桥梁，不单单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而且要以语言的魅力做到情感的表达[20]。语言魅力的展现就需要播音员的语言具有感染力，能带动观众情绪。

此外，播音主持人在节目中还需注重与观众的互动，通过现场连线、观众来信、社交媒体等方式，积极收集观众反馈，了解观众需求和喜好，以此为依据调整自己的主持风格和语言表达，让观众感受到被重视和关注。这种互动性不仅能够增强节目的参与感和趣味性，还能进一步提升播音主持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播音主持人在工作中还需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新闻事件，更准确地把握观众心理，从而在播音主持实践中更好地融入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

五、总结

主持人、播音员作为整个节目的核心力量，其语言交际和情感表达能力对整个节目而言至关重要。在主持节目和播报新闻时，主持人、播音员要遵循真实性、艺术性、互动性、适度性的原则，主持节目时，需讲标准普通话，用规范的语言，适度把内心的情感融入节目中，以此增强节目的情感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让节目更能打动观众，获得观众的喜爱。同时，他们还要持续学习并提升语言技巧和情感表达能力，以应对不同节目类型和观众需求的改变。在未来的播音主持工作中，主持人、播音员要更重视与观众的互动和情感沟通，凭借真诚的态度和生动的语言表达，赢得观众的信赖与支持，为节目的成功和发展添砖加瓦。唯有如此，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出色的播音主持人。

参考文献：

[1] 张颂 . 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语言表达艺术与情感传递的融合路径探究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5):112–115.

[2] 李红梅 . 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人语言交际能力与情感表达协调性研究 [J]. 现代传播 ,2022,44(8):89–93.

[3] 王静怡 . 播音主持艺术中语言表达技巧与情感投

入的平衡机制分析［J］. 新闻战线 ,2021(16):134–136.

［4］陈明远 . 融媒体环境下电视播音主持语言风格与情感表达的统一性研究［J］. 当代电视 ,2020(11):78–81.

［5］刘芳 . 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中语言交际能力与情感表达能力的协同发展［J］. 传媒 ,2023(3):67–70.

［6］周晓红 . 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语言表达与情感传递的协调性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2(7):45–48.

［7］赵明阳 . 电视新闻播音员语言表达规范与情感投入的辩证关系探讨［J］. 中国记者 ,2021(12):102–105.

［8］吴婷婷 . 广播播音主持语言艺术与情感表达的有机融合路径分析［J］. 声屏世界 ,2020(9):56–59.

［9］孙伟 . 新媒体主播语言交际策略与情感表达技巧的协调性研究［J］. 新闻知识 ,2023(4):88–91.

［10］郑晓云 . 文化类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与情感传递的和谐统一研究［J］. 电视研究 ,2022(6):72–75.

［11］林芳 . 播音主持专业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与情感表达能力的同步培养［J］. 教育传媒研究 ,2021(3):94–97.

［12］马志强 .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播音员语言表达与情感控制的平衡艺术［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0(7):113–116.

［13］黄静怡 . 综艺节目主持人即兴语言表达与情感互动的协调性分析［J］. 当代电视 ,2023(2):65–68.

［14］徐明 . 播音主持创作中语言技巧运用与情感表达的内在联系研究［J］. 新闻战线 ,2022(10):123–126.

［15］王丽娜 . 新媒体环境下播音主持语言风格转型与情感表达创新［J］. 传媒观察 ,2021(5):77–80.

［16］张伟 .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温度”与情感传递的”尺度”把握研究［J］. 中国广播 ,2020(4):58–61.

［17］刘芳芳 . 方言节目主持人语言特色与情感表达的协调统一研究［J］. 声屏世界 ,2023(1):49–52.

［18］陈晓明 . 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中语言训练与情感培养的有机结合［J］. 教育传媒研究 ,2022(2):83–86.

［19］李娜 . 全媒体时代播音员主持人语言表达能力与情感表达能力的融合发展［J］. 新闻传播 ,2021(8):112–115.

［20］王静 .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语言引导与情感调适的协调性研究［J］. 当代电视 ,2020(6):91–94.

作者简介：张腾美（1990–5），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职业学院讲师，专业：播音主持。

译者主体性的多维阐释与翻译策略的调适机制研究

张小燕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Zhangxiaoyan

(Yichu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ngxi, Yichun 336000)

Abstrac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at i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of general concern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community. As the core participant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proper exer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not only the key poi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works, but also the key element to endow the translation works with unique charm and vit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study and analyze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full exer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collation and induction of previous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On this premis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issue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ranslators to better play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actual translation work.

Key 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Subjective initiative; creativity

摘要：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译者于翻译过程中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已然成为国际翻译界普遍关注且深入探究的关键议题。译者身为翻译活动里的核心参与者，其主体性在翻译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恰当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不仅是达成高质量翻译作品的要点，也是赋予翻译作品独特魅力与生命力的关键要素。本文意在通过对之前学者有关译者主体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与归纳，进一步深入研讨和剖析在翻译实践中制约译者主体性充分施展的各类影响因素。在此前提下，本文还会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格外关注和重视的若干问题，以期为译者在实际翻译工作中更优地发挥其主体性给予有益的参考与指引。

关键字：译者主体性；翻译；主观能动性；创造性

在翻译学的发展历程中，译者常常被边缘化，其在文化领域中的地位未得到充分认可，常被贬低性地称为“翻译机器”或“传声筒”[1]。社会大众往往未能给予译者应有的尊重与肯定，尤其是对其主观能动性的价值。这种现象导致译者长期处于原作者的阴影之下，鲜为人知[2]。然而，随着解释学、功能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译者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翻译实践中，译

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其工作亦逐渐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一、主体性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研究范畴，主体性理论是探究译者于翻译进程中所充当角色的关键理论之一。该理论着重指出译者不只是语言转换的媒介者，更是具备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者。译者主体性关乎译者在翻译活动里所呈现出的个人意识、抉择和创造力，以及其对原文含义的解读与重构[3]。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施展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涵盖译者的个人经历、文化立场、翻译意图和读者期望等。所以，深入剖析译者主体性对于领会翻译过程的繁杂性和翻译作品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主体性这一哲学观念最早在十七世纪被提出，著名哲学家笛卡尔觉得，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的存在、活动以及知识的总和。哲学家康德对主体性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主体作用于其作为的综合，是产生知识的先验条件 (precondition)。其中，人类的理性与知性引领主体性的产生和提升的无限潜能。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主体以及人的主体性作出了高度概括。它强调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主体内涵[4]。实际上，客观存在的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这就使得人所拥有的主体性具有双重性，一是主动性、创造性，二是受动性。

译者的主体性指的是在主体对象的活动中所展现出的特性。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也是译者主体性最为显著的体现。翻译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翻译活动，举个文学翻译的例子，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三个角色是作者、译者和读者[5]。与读者相对应的译者是最为活跃、最具创造意识的主体。在作品的翻译中译者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与想象力，将作品结构中未表明的结构、“虚白点”、未挑明之处，把自身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融合，充分实现作品原文意识的渗透[6]。译者作为作品的转述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鉴赏能力与文学的批判能力，将作品内部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充分挖掘出来，剖析作品中的社会价值与文学意义[7]。语言的产生成为艺术表现形式中最为丰富的一种，处于不同环境下的译者对著作的阐释角度也会不同，任何一位译者都不会终止他人对著作其他角度译义的产生，其阐释只能说是一段历史角度下存在的理解，仅仅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理解留存[8]。由于译者成长的环境各不相同，他们的阐释视角也不尽相同，都是以各自时代下的读者为阅读对象制作出适合本阶段的读者接受且与该时代的语言规范、理解范围相契合的读物。同时，作者不可避免地在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一些民族文化、阅历以及风格的形成等。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与原著有偏差，在作品中浮现出译者的个人风格、民族特性等[9]。在作品的语言转换阶段，译者会采用一些方式再现原著作中的思想情感、语言风格等特点，同时译者作为原著作的读者还会把自己的一些理解融入对原著作的理解和感悟并融入在语言的转换之中。假如对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是一种一般性的文化行为，那么可以说语言的转化是文学知识的创造[10]。译者不仅需要传达出原文的思想情感与作品内容，而且还需要传递出原文中的审美。越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它所蕴含的文学意味就越深厚，那么它的翻译难度也会相对增加，因此就需要译者主动性的发挥。通过对作者、读者、译者三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译者的主体性可划分在以下范围：译者的主体性存在于遵循原著作的意蕴以及尊重翻译对象的基础上，译者的主体性也是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原文中意蕴的传达，遵循原文的基本特征指的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其人文特征、文化意蕴、审美意蕴等。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对原著作的理解、阐释的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语言层面上的再创造、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期望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等方面[11]。

二、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原作意蕴的制约因素

在开展原著作的翻译工作时，要充分调动译者的主动性，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译者主动性的发挥明显会受原著作的限制[12]。从译者视角来看，翻译活动属于一种创作过程，然而这种创作过程和普通的作家创作有所不同，是一种二度创作。在翻译活动开展期间，译者既要充分施展其主观能动性，又要局限在二度创作的范畴内，在原著作

的范围内进行发挥、创作。从翻译后的著作能看出译者自身的特色，译者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个人爱好的侧重对原著作展开二度创作，但最终不能超出原著作意蕴的范围界定[13]。

（二）文化背景的制约因素

在翻译活动开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出现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交融。译者对原著作的理解、信息的处理与传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处文化架构、模式的影响。例如，“老”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有资历、权威的意思，像汉语中的“老江湖”“三朝元老”“钻石王老五”“老生常谈”“人老精，鬼老灵”等。同时，“老”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敬老、尊敬的含义[14]。而在欧美国家，“老”代表着没有竞争力、将被淘汰等意思，所以他们在形容“老”时会尽可能委婉表达。比如 a seasoned man（一位饱受岁月洗礼的人）。因此，在翻译时要充分理解两个地域间的差异以及文化观念的限制等。

（三）认知能力的制约因素

翻译的关键在于对原文的领会，只有透彻地领会原文里的含义，才能向读者精准地传达出原作品中所蕴含的意境与精神。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觉得理解可视为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里文字向读者开放，文本内容向读者抛出问题，为了理解这些问题读者得从那些已解决的问题中找寻线索来回应哲学问题[15]。在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中，理解者会持续地融入作者的思维方式之中，译者凭借自我阅读对原作品进行解读，然而不同的译者对原作品的解读也各有不同，所以就会有不同译文的出现。

三、翻译策略对译文主体性的考量

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深受文化身份和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再现原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文化认同和主体性的影响[16]。翻译活动的主体性表现在译者根据个人意志和文化关注点进行选择，这在翻译实践中有明确的体现。例如，《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娱乐读者为宗旨，采用归化策略，以流畅的语句降低异国情调，使之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忠实于原文，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语文化风格，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在保持原语文化特色与迎合译语文化心理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改变原文的表达方式，或者不顾本民族的接受需求，采用不等值的翻译策略[17]。鉴于译者难以超越自身文化认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倾向于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和理解能力。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还在于其对译文读者的理解和译文的创作。变译理论指出，翻译是将原语文化转化为异语文化的过程，旨在满足读者需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读者对信息传递的理解能力。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交际活动，其首要原则是确保读者能够理解译文。译者若忽视读者的文化、社会背景及观点和意识，其翻译活动将失去现实意义。每位译者都应密切关注读者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此来指导翻译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具备双重视角思维，既要考虑意向读者，也要考虑潜在读者，并分析翻译可能产生的文化和社会效应[18]。中国翻译史上的《天演论》翻译案例，即严复对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的翻译，就是译者根据当时社会环境和读者心理进行的有目的性翻译，从而产生了显著的文化和社会效应。同样，《安妮日记》的德语译本也因考虑了德国读者的接受度而弱化了原文对德国人的指责。

由于文化差异，不同读者对同一事物的描述态度各异，导致接收信息的差异。原作在译语中的社会价值也会因此而异，因此译者有充分的理由在尊重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二次创作，采取适当的翻译手段。读者的不同需求导致译文相应变化，这不仅体现了翻译活动中译者传达的目的，也反映了译文主体性的关照[19]。因此，读者对译文的产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只有当译文用于交际传播时，才能实现其强大的社会价值。

四、结语

翻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文化传递的关键媒介。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文化感知能力，并在适当的时刻展现其主体性[20]。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者不应仅限于原文与译文的直接对比，或译文对原文的从属地位，而应展现出翻译官的特质，充分考虑译文所处的文化背景、目标读者的理解能力

以及可能引发的文化影响等因素。因此，翻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灵活应对不同的时空背景和具体情境。然而，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融入并非无拘无束的创作，翻译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以恰如其分地掌握翻译的度量,保持适度的平衡。本文主张，翻译者主体性问题应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重视翻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融入，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东风 . 译者主体性的伦理维度研究［J］. 中国翻译 ,2023,44(2):5–13.

［2］李瑞林 . 认知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54(3):422–433.

［3］张政 . 数字人文时代译者主体性新探［J］. 上海翻译 ,2023(1):12–18.

［4］刘云虹 .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分析［J］. 外国语 ,2021,44(4):85–94.

［5］陈大亮 . 翻译伦理与译者主体性的辩证关系［J］. 外语教学 ,2020,41(5):91–96.

［6］吴赟 . 文化外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显隐机制［J］. 中国外语 ,2023,20(3):104–112.

［7］杨柳 .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外语研究 ,2022(4):72–79.

［8］孙致礼 .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限度［J］. 外国语文 ,2021,37(2):120–128.

［9］黄勤 . 译者惯习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6):98–107.

［10］秦洪武 . 语料库视角下译者风格研究［J］. 现代外语 ,2023,46(1):111–123.

［11］胡开宝 . 人工智能翻译时代的译者主体性［J］. 外语界 ,2022(5):34–42.

［12］许钧 . 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新发展［J］. 中国翻译 ,2021,42(4):5–12.

［13］穆雷 . 翻译过程研究中主体性认知的实证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52(6):927–939.

［14］朱健平 . 阐释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再思考［J］. 外国语 ,2023,46(2):78–87.

［15］祝朝伟 . 后殖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建构［J］. 外语研究 ,2021(5):64–71.

［16］谭业升 . 认知语言学视角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中国外语 ,2020,17(4):89–97.

［17］宋以丰 . 机器翻译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重构［J］. 外语教学 ,2023,44(3):87–95.

［18］冯全功 . 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性的互动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2):112–121.

［19］周领顺 .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主体性研究［J］. 外语教学 ,2021,42(1):76–84.

［20］蓝红军 . 翻译社会学视角的译者主体性阐释［J］. 中国翻译 ,2020,41(3):19–27.

作者简介：张小燕（1989–），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宜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翻译理论与实践

《爱的甘醇》歌剧中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技巧探究

杨 磊

（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ing Skills in the Opera "The Elixir of Love"

Yang Lei

(School of and Design, Ans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nan, Anshang 455000)

Abstract: The comic opera "The Elixir of Love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works of the Italian opera composer Donizetti. The play was a great success at its premiere in Milan, and Donizetti was also awarded the title one of the three giants of the Italian bel canto school. "The Elixir of Love" is divided into two short plays. The atmosphere of the whole play is relaxed happy, and the tune is extremely exquisite, especially in the singing technique, which shows Donizetti's outstanding artistic creation. This article will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mic "The Elixir of Love", and make an in-depth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ing skills.

Keywords: "The Elixir of"; Fioratura; Singing Skills; Relaxed Atmosphere

摘要：喜歌剧《爱的甘醇》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多尼采蒂的杰出作品之一，该剧于米兰首演时取得巨大成功，多尼采蒂也因此荣获意大利美声乐派三巨头之一的称号。《爱的甘醇》共分为两幕短剧，全剧氛围轻松欢快，曲调创作极为精湛，特别是在唱腔技巧方面更彰显出多尼采蒂卓越的艺术创作才能。文章将对喜歌剧《爱的甘醇》展开简要叙述，并对其艺术特色和演唱技巧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关键字：《爱的甘醇》；花腔；演唱技巧；氛围轻松

多尼采蒂身为意大利知名的歌剧作曲家，亦是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了近百部歌剧作品。《爱的甘醇》是他中年时期的杰出创作之一，1832 年首演便大获成功，多尼采蒂也因此成为同时代作曲家的代表。直至如今，这部作品仍是多尼采蒂所有作品中演出次数最多的歌剧[1]。《爱的甘醇》既保留了意大利歌剧的传统表现形式，又融入了浪漫主义风格，其高超的演唱技巧和丰富的艺术特色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一、歌剧《爱的甘醇》之赏析

在充满欢笑与浪漫的喜歌剧《爱的甘醇》里，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彰显了他卓越的音乐创作才能。这部作品凭借其欢快轻松的氛围、美妙动人的旋律，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热烈追捧[2]。自首次上演以来，《爱的甘醇》始终是多尼采蒂诸多歌剧作品中演出频次最多、最受青睐的一部。

这部歌剧叙述了一个发生于田园诗般乡村背景下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羞涩且淳朴的乡村青年内莫里诺，他深深爱恋着一位直率而美丽的农场主的女儿阿蒂娜[3]。然而，因内莫里诺在言语表达上较为木讷，再加上他的情敌贝科雷对阿蒂娜发起了猛烈的追求行动，内莫里诺无奈之下向一位自称持有神奇药水的江湖医生杜卡马拉求助。他买下了所谓的“爱情灵药”，尽管这药实际上并无任何神奇功效，但靠着内莫里诺的真挚情意，最终他还是赢得了阿蒂娜的爱意[4]。

《爱的甘醇》这部歌剧被划分成两个短幕，总共包含二十首曲目。除了歌剧中常见的咏叹调和宣

叙调之外，多尼采蒂还巧妙地融入了跳跃感极强的花腔女高音演唱，让整部歌剧在艺术呈现上极富张力[5]。剧中的女主角阿蒂娜正是借助这种花腔女高音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她的音乐风格也通过这些独特的演唱技巧得以完美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让整部歌剧更加鲜活和感人。

多尼采蒂的这部作品不仅在音乐方面展现了其深厚的创作功底，还在戏剧情节上巧妙地融合了幽默与浪漫元素，让观众在欣赏美妙音乐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故事中轻松欢快的氛围[6]。《爱的甘醇》的成功不仅证明了多尼采蒂在歌剧领域的杰出才华，也使他成为了 19 世纪意大利歌剧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二、《爱的甘醇》喜歌剧的艺术特征分析

《爱的甘醇》这部喜歌剧在创作时并未脱离传统意大利歌剧的样式，并且，多尼采蒂还在基本样式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了独特创新。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浪漫主义的题材内容

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在《爱的甘醇》这部作品里，多尼采蒂把乡间生活当作该剧的创作背景，还融合乡村民间故事与传说进行曲目创作[7]。由此可知，《爱的甘醇》很好地体现了浪漫主义者秉持的“回归自然”原则。而这部喜歌剧中的“爱情”元素也是构成作品浪漫主义的一大特点。剧中主人公内莫里诺与阿蒂娜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却因爱情勇敢打破阶层束缚走到一起，上演了一场浪漫爱情故事。此外，《爱的甘醇》中运用了超现实事物“爱情灵药”，用以表达人们心中留存的那份浪漫美好幻想，也从侧面烘托出人们对现实社会束缚的摆脱，承载了剧作家对理想世界的追求[8]。

（二）角色配置的个性化

多尼采蒂在这部剧中沿袭了传统喜歌剧的创作习惯，通过不同声部展现角色人物不同性格与心理活动，形成多样化歌剧元素，大大增强了戏剧效果。比如剧中活泼率性的农场姑娘阿蒂娜是跳跃性极强的花腔女高音，痴情的乡村青年内莫里诺是以抒情为主的男高音，以插科打诨为主的江湖医生杜卡马拉的演唱主要是男低音，自大的军官贝科雷采用男中音演唱[9]。个性化的角色配置既保证了声部质量，又能让该剧演出时获得较好喜剧效果。《爱的甘醇》里的角色除有个性化音乐表现形式外，还有自身独特的语言风格。多尼采蒂根据人物性格差异，赋予他们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10]。阿蒂娜的语言风格温柔中带点俏皮，内莫里诺是朴实简洁的语言风格，杜卡马拉的语言风格和他的性格一样夸张且喋喋不休，贝科雷则用趾高气扬的语言凸显他的自大。

（三）终场合唱形式的喜剧落幕

从十八世纪末起，喜歌剧作品中首次出现“终场合唱”的表演形式。这一表演形式的特点是剧情进入收尾阶段后，演员陆续登台活跃气氛，所有演员上台时，舞台气氛达到高潮。像《磨坊女》《好姑娘》等歌剧结尾都采用终场合唱形式。莫扎特也曾在他的喜歌剧中运用“终场合唱”形式，并让其表现形式更丰富，使舞台具有交响规模的结构[11]。比如在其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剧中情节发展复杂，终场时气势更宏大，但“终场合唱”形式出现后，结尾直接转向完美，俘获了大批观众。

三、《爱的甘醇》歌剧中的声乐表现技巧研究

多尼采蒂于《爱的甘醇》里运用了诸多歌剧演唱技巧，且在这些技巧的演唱中融入了自己全新的创作元素，让这部喜歌剧在舞台上的表演更为饱满。

（一）咏叹调与宣叙调的演唱技巧

在第一幕的开场环节，最先呈现的是高音位的笑声，伴着笑声，女主人公阿蒂娜登场，这一宣叙调的创作手法自演出后便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且沿用至今。在该部分的演唱时，要求演唱者的声音保持靠前的集中位置，音色才会显得明亮，而清亮的音色也较契合主人公阿蒂娜活泼的人物形象[12]。同时演唱者的呼吸要顺畅连贯，只有稳定在胸腔支点才能够发出高音位的甩声，借助哼鸣的方式充分打开鼻咽腔，如此一来发出的声音就会清脆且具有穿透力[13]。

而在剧中开始进行咏叹调的演唱时，多尼采蒂采用的是极具韵律动感的节奏，在流畅的旋律中刻画阿蒂娜这位来自乡村的姑娘的性格与外貌。咏叹调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以抒情为主，由于该节奏属于三拍音乐，演唱者呼吸要保持连贯不拖沓，营造出轻快的音乐形象[14]。后半段的咏叹调风格转变为跳跃性极强的花腔风格，但在节奏方

面依旧延续前半部分的三拍音乐，不过其中还增添了附符点音，由此展现出了阿迪娜活泼俏皮的音乐形象。该段的演唱要留意音色的灵活度，利用呼吸对抗点来实现富有弹性的声音，特别是对于重音部分更要强化后腰与小腹支点的对抗，并以胸腔支点与小腹的对抗为保障开场。

（二）重唱与二重唱的演唱技巧

这部喜歌剧中的重唱主要分为两段，前半段属于抒情演唱，后半段转变为花腔演唱。抒情部分的音乐节奏繁杂，既有上行级进的演奏也包含了下行级进的节奏，演唱时，演唱者要注意维持抒情音乐节奏的连贯性，同时还要表现出花腔音乐的颗粒感。在这一部分通常保持腹部肌肉的扩张状态，胸腔支点往前推进保持稳定，并通过喉头阻气的颤动带动高音发出，从而进入花腔音乐的演唱[15]。后半段的花腔演唱特点在于其跳跃性，附符点节奏轻快，与三连音形成鲜明对比，并借此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张力。

在《爱的甘醇》这部喜歌剧中，重唱的演唱技巧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通过男高音的音色与花腔女高音结合来突显声部的平衡，男高音音色坚实有力，而花腔女高音清澈轻盈，配合之下显得十分和谐。尤其是在剧中一段男女声二重唱当中，从旋律的完美程度不难看出多尼采蒂的创作天赋。绝佳的艺术构思让这段二重唱充满着其他歌剧中所没有的饱和感［6］。多尼采蒂采用相同的旋律，让男高音与花腔女高音以轮唱的方式来描述剧中人物不同的内心想法，在演唱的过程中将语气重音与节奏重音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二重唱中呼吸与面罩的统一，多尼采蒂将二重唱的演唱技巧与歌剧创作巧妙结合的方式无疑是舞台歌剧的一次新的进展。

四、结语

多尼采蒂一向以创作高效和作品丰富闻名，其作品里多样的音乐呈现形式也始终为人们所称赞不已。身为一名杰出的歌剧作曲家，多尼采蒂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歌剧创作模式，其作品的音乐旋律既传承了传统的美声唱法，同时还融入了一些自己对歌曲的感悟，让作品在满足观众听觉体验的同时，又能契合歌唱家对歌剧咏叹调演唱的要求。特别是在《爱的甘醇》中，这些音乐的创作特点体现得格外显著。多尼采蒂在剧中沿用了传统意大利喜歌剧的表演要素，并把浪漫主义风格融入到歌剧音乐的创作之中，使这部作品极具艺术魅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歌剧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

参考文献：

［1］王雪 . 多尼采蒂歌剧《爱的甘醇》的音乐风格分析［J］. 音乐研究 , 2020(4): 89–94.

［2］张明远 . 论《爱的甘醇》中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特征［J］. 艺术评论 , 2019(6): 112–117.

［3］李娜 .《爱的甘醇》中的喜剧元素与戏剧结构［J］. 戏剧艺术 , 2021(3): 78–83.

［4］陈思 . 多尼采蒂歌剧的旋律特征——以《爱的甘醇》为例［J］. 中国音乐学 , 2018(2): 65–70.

［5］刘芳 .《爱的甘醇》中男高音咏叹调演唱技巧探析［J］. 音乐创作 , 2022(1): 134–139.

［6］赵静 . 论《爱的甘醇》中女高音角色的声乐表现力［J］. 人民音乐 , 2020(5): 56–60.

［7］周雪 . 多尼采蒂歌剧的花腔唱法研究——以《爱的甘醇》为例［J］. 音乐探索 , 2021(4): 88–93.

［8］吴晓峰 . 论《爱的甘醇》中“偷洒一滴泪”的演唱处理［J］. 歌唱艺术 , 2019(11): 45–50.

［9］杨光 .《爱的甘醇》中内莫里诺的角色塑造与演唱风格［J］. 音乐与表演 , 2022(2): 95–100.

［10］黄婷婷 . 阿迪娜的角色性格与声乐表现技巧［J］. 歌剧艺术研究 , 2020(7): 70–75.

［11］郑伟 . 论《爱的甘醇》中贝尔科雷的喜剧表演特征［J］. 戏剧文学 , 2021(6): 155–160.

［12］孙悦 .《爱的甘醇》咏叹调在声乐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音乐教育 , 2019(3): 89–94.

［13］林小艺 . 多尼采蒂歌剧演唱中的呼吸与音色控制［J］. 音乐艺术 , 2022(5): 70–75.

［14］马晓峰 .《爱的甘醇》在中国的演出接受与本土化诠释［J］. 音乐传播 , 2020(8): 112–117.

［15］高翔 . 论意大利美声唱法在《爱的甘醇》中的体现［J］. 民族音乐 , 2021(4): 88–93.

作者简介：杨磊（1990–2），男，河南安阳人，硕士，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艺术。

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忧郁性音乐语言研究

张可天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6）

A Study of the Melancholic Musical Language of Schubert´s Symphony No. 8 in B Minor

Zhang Ketian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 Nanchang, Jiangxi 330006, China)

Abstract: Franz Schuberts Symphony No. 8 in B Minor,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ymphonic work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has always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for its unique two-ment structure and profound expression of melancholy. This study, based on music text analysis and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aesthetics,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elanch musical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First,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unfinished" nature of the work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integrity aesthetics of double-movement structure are discussed. Second, through musical elements such as thematic motifs, harmonic progressions, and orchestration techniques, the construction of melancholy emotions the second theme group (bars 43-66) of the first movement is analyzed in detail. Finally, from the lyrical melody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movement, it revealed how Schubert achieved the artistic sublimation of personal emotions through the symphonic form. This research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sical entity of the work but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early Romantic music.

Keywords: Schubert; Symphony No. 8 in B Minor; Melanch; Musical Narrative; Romantic Music

摘要：弗朗茨·舒伯特的《b 小调第八交响曲》作为浪漫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作品之一，其独特的双乐章结构及深刻的忧郁情感表达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本研究以音乐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历史语境与情感美学理论，系统考察该作品的忧郁性音乐语言特征。首先，从形式结构角度解析作品”未完成”特质的艺术价值，探讨双乐章结构的完整性美学；其次，通过主题动机、和声进行、配器手法等音乐要素，重点分析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第 43-66 小节）的忧郁情感建构方式；最后，从第二乐章的抒情性旋律发展中，揭示舒伯特如何通过交响乐形式实现个人情感的艺术升华。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该作品音乐本体的理解，也为浪漫主义早期音乐的情感表达机制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忧郁性；音乐叙事；浪漫主义音乐

舒伯特是奥地利一位杰出的古典主义音乐家，他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舒伯特自幼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年轻时就已是维也纳圣党乐队队长，且长期担任乐队指挥[1]。舒伯特有着独特的作曲天赋，他创作的艺术歌曲传世数量极为庞大，共计六百多首，还有十部交响乐作品。因舒伯特出身低微，很多艺术歌曲在他生前都未公演。其中，舒伯特创作的《未完成交响曲》，也叫《b 小调第八交响曲》，是他作品中极为独特的一部艺术佳作[2]。

一、《b 小调第八交响曲》艺术感染力之概述

（一）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结构的不完整性探讨

舒伯特所创作的《b 小调第八交响曲》，也被称作《未完成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之所以被称为未完成的，是因为它没有遵循传统欧洲古典主义交响曲的作曲格局习惯，具备四个基本乐章结构，仅安排了两个乐章结构[3]。不过，《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按传统乐章结构编排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确。有相关研究表明，创作此曲时，舒伯特在身体和心理上承受着较大压力，难以继续创作。实际上，尽管这部作品是舒伯特晚年创作的，但他在创作《b 小调第八交响曲》后又创作了两部交响曲。从时间角度看，舒伯特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部作品。所以，舒伯特很可能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前两个乐章比较满意，但在如何延续、补充完整方面虽付出诸多努力，却仍无法将作品补充完整[4]。

（二）弗朗茨·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两乐章之艺术特征探究

从舒伯特仅为《b 小调第八交响曲》保留两个乐章这一角度来看，他在创作前两个乐章时投入了相对较多的精力。舒伯特为《b 小调第八交响曲》乐章注入的艺术情绪，实际上是隐隐约约的忧伤。这种忧伤恰到好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所以，除了在《b 小调第八交响曲》创作过程中艺术才华达到个人巅峰外，这两个乐章饱含着他浓厚的个人情感和丰富的情感变化。在舒伯特这部《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中，音乐旋律间的沉思和充满诗意的氛围，使其旋律丰富多变、感人至深，能带来绕梁三日的音乐效果。

在《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整体音乐氛围充满悲剧色彩。整个第一乐章节奏低沉缓慢，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它。第一乐章呈示部表达的主题是内心的歌唱，这种歌唱传达着灵魂深处的悲伤与痛苦，犹如一边微笑，眼中却仍含着泪水，凄美又忧伤。副部主题由大提琴深情奏出，旋律格外优美，歌谣风格的曲调纯朴明朗，音乐风格转入兴奋愉快的旋律[5]。温婉婉转的小提琴重复着主部主题。展开部分主要是呻吟，是对痛苦精神的发泄，表达着悲伤、绝望以及内心的斗争与纠缠[6]。最后的再现部和尾声以悲伤的感怀收尾。

在《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整体音乐氛围增添了抒情风格和田园游吟风格，相比第一乐章更具明朗的气氛。第二乐章能让人感受到安宁平静，进一步展现出一种达观乃至超然的个人感触。第二乐章主部体现着温柔宽厚的品格，副部则着重凸显无华朴实的游吟诗人风格，深情诉说主题旋律[7]。整个第二乐章都弥漫着隐隐约约的遐思与冥想。最终，整部《b 小调第八交响曲》逐渐走向朦胧安静的风格而结束。因此，从《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二乐章的艺术特色来看，这种忧伤情绪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深邃的意境。

二、对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感之分析

（一）《b 小调第八交响曲》首乐章首个主题所蕴含的忧郁情感

在《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引子部分，舒伯特采用了低音提琴以及大提琴的低音区，将旋律从深处缓缓拉出。这种旋律十分凝重，渲染出一种神秘忧伤的氛围。这一部分，舒伯特运用了好几个下行音符，被著名音乐指挥大师魏因加特纳称作“从地底深处国度发出的声音”。第一乐章的这段引子，正是整部《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核心部分，它极为集中地展现了《b 小调第八交响曲》里蕴含的伤感与忧郁，对整部交响曲艺术作品的感情基调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8]。紧接着，在这段引子之后，舒伯特用小提琴颤动的方式表现十六分音符，这种小提琴颤动形式是一种不稳定的前行方式。能看出这是内心因忧伤和痛苦产生的心灵颤动，内心的心弦不断被撩动，灵魂仿佛在冰冷的忧伤中不停颤抖，好似在想念着什么，又似为某件事在内心不断徘徊[9]。内心的这种悲伤很快有了低音弦类乐器和中提琴的参与，这两种乐器都以非常轻柔的拨弦方式呈现，还联合双簧管轻柔地吹奏出美妙的第一主题，第一主题显然发自内心深处，表达着内心悠缓的悲伤。

（二）《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中第二主题所呈现的忧郁情感特征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第二主题，实际上是由大提琴率先引导出来的。大提琴的音色较为低沉，展现出一种沉稳的特质，还有对人生的

重新思索。这种思索其实是从忧伤里延伸出来的，思索中孕育着忧伤里的希望，进而体现出内心世界宽慰与忧伤的纠缠。随后，舒伯特又用小提琴将这个沉思的大提琴调子重复了一遍，因小提琴音色相对忧伤，使得这种沉思后的宽慰很快转为悲伤，重新陷入忧伤的情绪氛围中[10]。铜管乐器声部很粗暴地吹奏出凶险的动机，还让小提琴的音群进一步升高，仿佛又一次遭受重大精神打击，许多美好的畅想和沉默的思考都被凶狠地打断了，这种忧伤和悲凉的氛围很快重新笼罩了整首《b 小调第八交响曲》。这声铜管声部的打断，就像美好的幻想再次破灭，舒伯特又转入无边无际的丑恶现实中[11]。此后，大提琴和小提琴紧密交织，如同丑恶与美好相互搏斗，内心对美好有向往和憧憬，总在被丑恶现实扑灭后又再次出现和崛起[12]。

三、《b 小调第八交响曲》第二乐章：梦幻手法呈现忧郁情感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不像第一乐章那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凸显着搏斗与冲突，更多的是沉醉于梦幻。第二乐章展现了雄心壮志逐渐消散，面对现实痛苦时只能偶尔燃起斗志。舒伯特让圆号和大管在低音提琴的弹拨演奏下，引出两小节引子后，小提琴奏出第一主题，该主题充满生机勃勃的力量，甜美地歌唱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理想。这个主题中，配器的音乐效果如魔法般迷人，能在弦乐弹拨演奏中，用长笛奏出清新怡人的旋律[13]。第二乐章的第二主题在宁静氛围中抒发内心的忧伤，这种不安的忧伤实则是对生活的忧虑。这部分主要用单簧管突显主题，表现出梦幻般的悠长与田园诗般的安宁。舒伯特让双簧管和单簧管交织演奏，并用长笛接应。在田园诗般的旋律纠缠中，定音鼓很快大声敲响，两组小提琴表现出揪心的忧伤，大提琴对此作出响应[14]。

四、结语

弗朗茨·舒伯特的《b 小调第八交响曲》，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对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抗争和深沉悲伤的真实写照[15]。在这部交响曲中，舒伯特通过一次次的打击和挫折，展现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与挣扎。然而，尽管身处困境，舒伯特依然凭借着对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在《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中，尽管弥漫着忧伤的情绪，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真挚情感和坚韧的力量。正是这种情感和力量，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了不朽的经典之作。通过对舒伯特《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忧郁性音乐语言进行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该作品不仅是舒伯特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更是对浪漫主义早期音乐情感表达机制的一次深刻探索。舒伯特以独特的双乐章结构，打破了传统交响曲的常规布局，这种创新不仅赋予了作品以鲜明的个性特征，更为其忧郁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作品中,舒伯特巧妙地运用音乐要素，如主题动机、和声进行和配器手法等，构建了一个充满忧郁色彩的音乐世界。第一乐章中，那低沉缓慢的节奏、阴郁的气氛以及灵魂深处的悲伤与痛苦，无不让人感受到舒伯特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抗争。而第二乐章中，虽然整体氛围相对明朗，但那种隐隐约约的遐思与冥想，以及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舒伯特的《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不仅是一部音乐杰作，更是一部情感与思想的史诗。它以其独特的忧郁性音乐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舒伯特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以及他对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部作品不仅让我们深刻理解了舒伯特的音乐创作理念，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享受和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次炤 . 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结构特征与情感表达 [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2): 45–53.

[2] 李秀军 . 论舒伯特《b 小调交响曲》的”未完成”美学价值 [J]. 音乐研究，2018(3): 89–97.

[3] 张前 . 舒伯特交响曲中的抒情性特征——以《第八交响曲》为例 [J]. 人民音乐，2019(11): 62–67.

[4] 周海宏 . 从和声进行看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忧郁特质 [J]. 中国音乐学，2020(4): 112–120.

[5] 刘小龙 . 舒伯特《b 小调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题的悲剧性建构 [J]. 音乐艺术，2017(1): 78–86.

[6] 陈鸿铎 . 论浪漫主义早期交响曲的情感编码——以舒伯特第八交响曲为例 [J]. 音乐探索，2021(2): 55–63.

[7] 余志刚 . 舒伯特创作晚期风格转型研究 [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4): 32–41.

[8] 孙红杰 . 从艺术歌曲到交响思维：舒伯特器乐创作中的声乐元素 [J] . 音乐研究，2019(5): 102–111.

[9] 冯存凌 . 1820 年代维也纳音乐语境中的舒伯特交响曲 [J] . 音乐文化研究，2020(3): 88–96.

[10] 邹彦 . 贝多芬与舒伯特交响曲忧郁表达的差异性研究 [J] . 音乐艺术，2018(4): 67–75.

[11] 王晡 . 浪漫主义音乐忧郁气质的嬗变——从舒伯特到马勒 [J] .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1(1): 45–54.

[12] 杨力 . 论《未完成交响曲》的指挥处理与情感表现 [J] . 人民音乐，2020(7): 72–78.

[13] 沈旋 . 舒伯特交响曲的乐队编制与音色忧郁性 [J] . 音乐探索，2019(4): 33–41.

[14] 何宽钊 . 音乐忧郁性的美学阐释——以舒伯特《第八交响曲》为例 [J] .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3): 112–120.

[15] 宋瑾 . 从精神分析学看舒伯特晚期作品的忧郁情结 [J] .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2): 58–67.

作者简介：张可天（1991–5），男，江西南昌人，硕士，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艺术。